

# 程晉芳《書》學觀探驪

——暨「《總目》書類提要多出其手」說重審\*

宮 瑞 龍\*\*

## 提 要

在四庫館臣當中，程晉芳可謂是相當特殊的一位。他的學術趣向側重宋學，其經學觀念多有別於《四庫全書總目》，而唯獨《尚書》學觀點則與《總目》較為接近，因此，有學者即主張，《總目》書類提要可能多出程晉芳之手。儘管程氏的《尚書》學著作今已亡佚，但在《勉行堂文集》中，尚存有五篇相關文章，其《尚書》研究仍可窺一斑。本文即通過對這五篇文章及程氏的書籍收藏、閱讀與交遊情況的梳理，指出程氏收藏和閱讀的《尚書》類著作既有辨偽古文之作，

---

本文109.08.15收稿，110.01.17審查通過。

\* 本文曾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51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41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0年11月6日)。寫作過程中，多方得益於蔣秋華先生、夏長樸先生的指導，以及討論人簡承禾教授、編委會和諸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謹申謝悃。惟一切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102\_(51).0004

亦有衛護古文之作，還有主張古文為偽而不能廢的，而程氏則認同第三說，閻若璩、程廷祚、沈彤等人的著作及入四庫館的經歷對其《尚書》學觀點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相比之下，這些觀點與《總目》書類提要之間有同有異，不能僅據其間的趨同之處來判定提要作者，且部分提要甚至別有來源，「《總目》書類提要多出其手」之說尚待商榷。

**關鍵詞：**程晉芳、《尚書》學、《四庫全書總目》

# On Cheng Jin-Fang's Views of *Books of Documents (Shang-Shu)*:

A Discussion from the View that the Catalogues of Books about *Shang-Shu* in *Zong-Mu* Were Mostly Written by Cheng

Gong Rui-long \*

## Abstract

Among the compilers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ikuquanshu)*, Cheng Jin-Fang is rather particular. His academic standpoint is close to Song School (*Song-Xue*), and his ideology of Classics (*Jing*) is mainly different from *Annotated General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ikuquanshu Zong-Mu)*. Meanwhile, his opinions about *Books of Documents (Shang-Shu)* are similar to *Zong-Mu*. It is thus concluded that the catalogues of books about *Shang-Shu* were mostly written by Cheng. Although Cheng's works about *Shang-Shu* have disappeared, there are still five articles in his collected writings *Mian-Xing-Tang Wen-Ji*, which are related to his studies on *Shang-Shu*.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se articles and the research about Cheng's book collection, read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works of *Shang-Shu* category Cheng collected and read hold

---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arious ideas: some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Books of Documents in Ancient Chinese* (*Gu-Wen Shang-Shu*), some defend against these questions, and some insist that *Gu-Wen Shang-Shu* is fake but cannot be deleted, which Cheng agreed with. Cheng's views about *Shang-Shu* were shaped in different degrees not only by the works of Yan Ruo-Qu, Cheng Ting-Zuo, and Shen Tong, but also by his participation in compiling *Sikuquanshu*. These views are simultaneously different and similar to *Zong-Mu*, which we cannot simply vindicate the authorship of the catalogues on the basis of the similarities. Furthermore, some catalogues can be proved to be written by other authors. In conclusion,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catalogues of books about *Shang-Shu* in *Zong-Mu* were mostly written by Cheng.

**Keywords:** Cheng Jin-Fang; Studies of *Books of Documents* (*Shang-Shu*); *Annotated General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ikuquanshu Zong-Mu*).

# 程晉芳《書》學觀探驪

——暨「《總目》書類提要多出其手」說重審

宮 瑞 龍

## 一、引言

程晉芳（1718-1784），初名廷鑽，字魚門，號戢園，安徽歙縣人。他出身於鹽商世家，但「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sup>1</sup> 與當時不少的考據、文章之士都有來往。他早年一度科場失意，累試不售，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南巡，程氏因獻賦而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遂中舉，授內閣中書。乾隆三十六年（1771），詔開太后八旬萬壽恩科，程氏遂中進士，位列二甲第二十四名，改吏部主事。次年，四庫館開，程氏被舉薦為總目協勘官，迨《四庫全書》修竣，又授翰林院編修，任奉政大夫、文淵閣校理。

---

<sup>1</sup> 清·袁枚：〈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見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附錄〉，頁847-849；亦見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26，頁292上，影印底本為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不過關於其具體藏書卷數，漆永祥曾提出異議，認為藏書五萬卷之說均出自他人描述，而程晉芳的〈桂宦藏書序〉中自敘藏書僅三萬餘卷，〈曝書〉詩亦云「牙籤三萬軸」，翁方綱所作墓志銘亦作「三萬餘卷」，當以三萬為是。見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15-216。

然而程氏在京為官十餘年，仍為貧病所困，迫於生計，乃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入陝西巡撫畢沅幕下，不幸因旅途勞頓，次年夏即病故，享年六十七歲。其著述頗豐，撰有《周易知旨編》、《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群書題跋》六卷、《桂宦書目》二卷，皆佚，又有《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三卷、《戢園詩集》十卷、《勉行堂詩集》二十四卷首一卷、《勉行堂文集》六卷，今存。<sup>2</sup>

程氏素以詩人自處，而時人亦多以詩人目之，譬如他曾自承：「所學唯詩自信。」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許為「第一詩功海樣深」，「一生以詩為最」，<sup>3</sup> 趙懷玉亦稱其「詩名最重」，<sup>4</sup> 而陳鍾麟所謂「宇內士大夫識與不識，靡不推為詩人」，<sup>5</sup> 更可代表同時人的普遍意見。不過程晉芳的學問罕受重視，也和清中葉以降漢學漸成主流的學術發展趨勢有關。翁方綱曾指出，程氏的學術趣向是「篤守程、朱」、推崇宋學的，<sup>6</sup> 而在程氏的文集中，即不難看到他對當時重漢學、輕宋學之風的批評，甚至他取「戢園」為別號，亦是出於對明末理學家劉宗周(號戢山)的敬慕。據翁方綱的墓志銘記載，程氏「束髮時，讀戢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戢園』自號」，<sup>7</sup> 由此也可看到，程氏受

<sup>2</sup> 以上關於程晉芳的生平、著述，見程治國：〈關於程晉芳生平的幾點考辨〉，《陝西教育（理論版）》2006年第12期，頁301、304；楊錦先：〈程晉芳的里貫與科第〉，《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41；王勇：〈程晉芳著述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3期，頁112-116。

<sup>3</sup> 清·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卷10，頁357。

<sup>4</sup> 清·趙懷玉：〈勉行堂五經說序引〉，見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頁683-684。

<sup>5</sup> 清·陳鍾麟：〈勉行堂文集序〉，見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頁685-686。

<sup>6</sup> 清·翁方綱：〈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戢園程君墓誌銘〉，見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附錄〉，頁845-847；亦見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14，頁479下，影印底本為清李彥章校刻本。

<sup>7</sup> 同前註。

宋明理學浸染甚深。也正因如此，當《漢學師承記》卷七反而將程氏視為漢學學者收入其中時，李慈銘即痛斥道：「程晉芳實不知學，其《勉行齋文集》中妄言甚多。」並認為江書誤收程氏，實因未見其書：「此《記》於漢宋門戶別擇甚嚴，而晉芳獨濫入者，由江氏未見其書故也。」<sup>8</sup>而漆永祥亦謂：「江氏實不知程氏所治何學，惟於影響之間，遂入《記》中。」<sup>9</sup>

如不少論者所揭示，乾隆詔修《四庫全書》，其學術傾向是崇尚漢學而貶抑宋學。既然程氏抱持的是偏好宋學的學術傾向，程氏所撰提要或亦不免被改易的命運。近些年來，隨著四庫提要分纂稿的面世，學界已開始關注各分纂官提要稿的原始面目在總纂官修訂、總裁官裁正、清高宗欽定的過程中，經歷了何種變化。總的來看，現存分纂稿最多的是翁方綱，其次是姚鼐、邵晉涵、沈叔埏，至於程晉芳的分纂稿，迄今僅有杜澤遜發現的一篇〈《南夷書》提要〉，不過此稿與《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的提要大致相同，甚至存在原稿不誤而《總目》妄改之處。<sup>10</sup>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編纂、修訂歷程的研究，首屈一指的當屬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一書，此書圍繞分纂稿與《總目》之間的異同，展開了集中探討。在通閱《勉行堂文集》後，他發現共有 24 篇序跋所題之書見於《總目》，遂將這些序跋與《總目》逐一比對，分析二者的異同，並指出程氏作為程朱理學派，其學術旨趣顯與《總目》格格不入。具體來說，程晉芳與《總目》

<sup>8</sup>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李慈銘校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漢學師承記》卷 7〈程晉芳記〉有此批語，此據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轉引，見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國朝漢學師承記》，《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卷 7，頁 698。

<sup>9</sup>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頁 380-381。類似表述又見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697-698；漆永祥：〈江藩《漢學師承記》之誤錄程晉芳〉，《清學札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年），頁 180-182。

<sup>10</sup> 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纂稿〉，《圖書館建設》1995 年第 5 期，頁 70-71。

學術觀點的異同共有六個方面：

其一，程氏學術宗旨重宋輕漢，與《總目》推尚漢學正相反；

其二，程氏的《易》學觀與《總目》相反，甚至程氏曾公開批評後者；

其三，程氏的《書》學觀與《總目》相近；

其四，程氏的《詩》學觀兼重宋學，與《總目》尊崇毛、鄭亦相反；

其五，程氏的《禮》學觀與《總目》相反；

其六，程氏認可「有明士氣之盛」，其士氣觀與《總目》重點抨擊講學、門戶、朋黨之風亦相反。<sup>11</sup>

在這六條之中，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第三條，司馬朝軍在對讀程氏〈《尚書今文釋義》序〉、〈《尚書古文解略》序〉和《總目》的〈《尚書正義》提要〉、〈《古文尚書疏證》提要〉之後，接著做出了一個推測：「《總目》書類提要可能多出程晉芳之手。」這一觀點還被此書引言<sup>12</sup>和結論<sup>13</sup>列為首次提出的新觀點，三致意焉，足見司馬朝軍對此說的高度重視。

然而筆者不禁想問，程氏的《書》學觀究竟為何？其觀點又是受何人何書影響？淵源於何處？這些觀點是否確與《總目》相近？又能否據此而推知《總目》的書類提要出自程氏之手？儘管程氏的《尚書》學著作——《尚書今文釋義》、《尚書古文解略》——均已亡佚，但在《勉行堂文集》中，尚存有兩書的序言以及他為程廷祚、盛百二的《尚書》學著作所作的〈《晚書訂疑》後序〉、〈《尚書通議》跋〉、〈《尚書釋天》跋〉這五篇文章，庶可藉此管窺程氏《尚書》學觀念之大要。

值得一提的是，這五篇文章基本作於程氏晚年。〈《尚書通議》跋〉云：「余

<sup>11</sup>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章〈分纂官與《四庫全書總目》〉第八節〈程晉芳與《四庫全書總目》〉，頁47-77。

<sup>12</sup> 見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頁5。

<sup>13</sup> 同前註，頁726。

壬午赴京師……越十一年，治《尚書》，始詳讀之，為識其要于末云。」「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越十一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程氏時年五十六歲，則此跋當作於此年或稍後。

〈《尚書今文釋義》序〉云：「癸巳之夏……重加裒輯，三年而第二稿成。又三年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癸巳」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年後《尚書今文釋義》第三稿成時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程氏時年六十二歲，與文中「年已六十餘」之語相合，此序當作於此年或稍後。

〈《尚書古文解略》序〉云：「辛丑初夏，排纂《今文釋義》第四稿竣……凡六閱月而成《解略》六卷。」「辛丑初夏」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六閱月」即當年十月時，《尚書古文解略》成書，程氏時年六十四歲，則此序當作於此月或稍後。

〈《尚書釋天》跋〉未明言寫作時間，文中稱盛百二「作令于山東，今不復仕，教授歷城」，而盛氏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中舉，任淄川知縣，一年後以疾辭歸，講學齊魯間，此跋既言「今不復仕」，顯係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所作。況且文末稱程氏所見本「前有自序及其外甥朱休承序」，而現存《尚書釋天》的早期刻本有乾隆十八年（1753）秀水李氏刻本與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城書院刻本兩種，前者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書號：A01895）與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各藏有一本，書前均僅有盛百二序，無朱休承序，而後者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書號：A01896）與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各藏有一本，書前均有盛百二自序與朱休承序。由此可見，程氏所閱《尚書釋天》當為任城書院刻本，此跋至早當作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程氏時年五十七歲。

〈《晚書訂疑》後序〉亦未明言寫作時間，文中提及程廷祚晚年寫成《晚書訂疑》時未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其後程晉芳「購《疏證》以贈之」一事，而程廷祚〈《尚書古文疏證》辨〉則云：「丙子季夏，家葢園始攜（《尚書古文疏

證》)至金陵,時余書已成四載矣。」<sup>14</sup>「丙子季夏」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贈書一事蓋在此時,程晉芳時年三十九歲,而文中述及此事時口吻頗似追憶,則此序寫作時間當更晚。

綜上可知,這五篇文章之中,四篇都可確知係作於程晉芳五十六歲之後,頗有「晚年定論」的意味,故文中所傳達的《尚書》學觀念,主要是其晚年的思想。因此,筆者謹就這五篇文章,梳理程氏的《尚書》研究,從其書籍收藏、閱讀與交遊的角度,剖析這些觀點的來源,並與《總目》對照,試圖重新思考《總目》書類提要的來源問題。

## 二、程晉芳的《尚書》學觀念

### (一)《尚書》的大旨：「二帝三王之道」

談及程晉芳的《尚書》學觀念,自不能繞過其對《尚書》此書性質的認識,而程氏在《尚書今文釋義》的序言中,即明確表示:

**二帝三王之道,莫備於《書》**,自**天文**、**輿地**、職官、樂律、禮制、刑罰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得其片言微義,皆足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綿翼子孫于世世。<sup>15</sup>

顯然,程氏是持一種頗為實用的觀點來看待《尚書》的,他認為其中包蘊著上古二帝三王的治道,天下國家的治亂端繫於此,天文、地理的自然規律與職官、音

<sup>14</sup> 清·程廷祚:《〈尚書古文疏證〉辨》,《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78。

<sup>15</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

樂、禮儀、刑律等各項制度，罔不囊括其中，而如果這些道理與法度稍得施用於現實政治的話，則足以安定天下，延及萬世。類似的觀點亦見於〈《尚書釋天》跋〉：

六經之書，《易》之體段最精，《書》之體段最大，天文、輿地尤典據中最要者。<sup>16</sup>

可見程氏認為六經之中，《尚書》包羅最廣。與前引〈《尚書今文釋義》序〉首揭「天文、地理」類似，這裡程氏亦特別拈出「天文、輿地」，列在首位，視為「典據中最要者」，而他以「體段最大」稱《書》，亦讓人聯想到宋儒喜用的「聖人體段」、「道之體段」之類的語彙。不過更須注意的是，這種以「二帝三王之道」盡備於《書》的觀點並不新鮮，而同樣是淵源於宋儒的。南宋蔡沈在〈《書集傳》序〉中就曾說過：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sup>17</sup>

至於二帝三王之道的具體內容，程晉芳進一步解釋說：「要其大旨不過二端：知人、安民而已。非惇、德、允、元則不能知人，人不知則民無自而安，而安民之要，未有過于省刑、薄稅者也。」此語所及的幾個概念，均載於經文，如「知人」、「安民」語出〈皋陶謨〉，「惇、德、允、元」語出〈堯典〉的後半部分（即古文〈舜典〉），「省刑」、「薄稅」語出《孟子·梁惠王上》，然而若回溯原典的語

<sup>16</sup> 清·程晉芳：〈《尚書釋天》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5，頁779。

<sup>17</sup> 南宋·蔡沈：〈九峰蔡先生書集傳序〉，見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3。

境，經文中實則尚未特別突出前述概念，更未強調「知人」當先於「安民」的次第，而正是朱熹、楊時等宋儒，纔指出「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sup>18</sup>「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並表明「知人」應先於「安民」，「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sup>19</sup> 翁氏所謂程氏「篤守程、朱」，於此可窺一斑。

## （二）晚《書》與孔《傳》均為偽作

然而宋學發展至此，歷數百年，程、朱之學積弊漸多，已飽受陸、王一派攻訐，況且學術之升沉顯晦，各有其時，單就《尚書》學而言，至程晉芳所處的清中葉，即已出現一大公案，為時人所不得不面對，亦即古文及孔《傳》真偽問題。早在乾隆十年（1745），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就由眷西堂刊刻，在程晉芳的時代，此書已大行於世，並被收入《四庫全書》，其以《古文尚書》與孔《傳》為晚出偽作之說，也漸為時人採納。綜觀程氏文集，他顯然也是認同閻氏此說的，他不僅坦承孔《傳》為「晚出」，<sup>20</sup> 梅《書》為「後起偽作」，<sup>21</sup> 足見其承自閻若璩一派的學術觀點，視《古文尚書》為梅賾偽造，而且他對《古文尚書》辨偽的學術史脈絡，亦是諳熟於心的：

梅氏晚出《書》，元明諸賢雖間一辨之，而未極其致。我朝閻伯詩、程綿莊、惠定宇輩出，始抉摘無遺蘊。雖以西河之博識多聞，為之奮臂大呼，

<sup>18</sup> 南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頁206。

<sup>19</sup> 《書集傳》引楊時語，見南宋·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頁35-36。

<sup>20</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715。

<sup>21</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莫能翻已成之案也。<sup>22</sup>

國朝諸儒，承草廬吳氏、震川歸氏、旌川梅氏之緒言，力辨梅氏《古文尚書》之偽，其尤明晰不可奪者，閻伯詩之《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之《古文尚書考》；佐之者，家綿莊之《晚書訂疑》也。先是，西河毛氏力主古文非偽作，撰《古文尚書冤詞》。綿莊後起，別撰《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毛氏；晚年，復成是書。……閻氏、惠氏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來。綿莊亦類是。<sup>23</sup>

簡言之，他認為對《古文尚書》的辨偽，元代吳澄、明代歸有光和梅鷟已啟其端，但不夠徹底，清初以來，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程廷祚《古文尚書冤冤詞》及《晚書訂疑》、惠棟《古文尚書考》始致力於此，他們逐一指出《古文尚書》輯錄佚文雜湊成篇的出處，終於使古文為偽之說成為「已成之案」，其間雖有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竭力辯駁，依然無從翻案，可見他相當重視閻若璩、惠棟、程廷祚的辨偽成就。然而，對於晚《書》何以為偽，程氏在這幾篇文章中未予詳論，只是採納了閻若璩等人的說法，稱此書「成于襲績之功，鍼綫之跡顯然，而一一皆有自來」，<sup>24</sup> 即謂偽《古文尚書》的文段往往其來有自，拼湊彌縫的痕跡太過明顯。

<sup>22</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卷2，《勉行堂詩文集》，頁715-716。「閻伯詩」即閻若璩，字百詩，蓋得名自應璩〈百一詩〉，「伯」、「百」古字可通，且程晉芳集中多寫作「伯」，故本文引述時均不作修改。

<sup>23</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卷2，《勉行堂詩文集》，頁737-738。

<sup>24</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卷2，《勉行堂詩文集》，頁715-716。

### (三)《古文尚書》與宋人之說尚不可廢，當與今文分別觀之

儘管朱熹本人就曾對《古文尚書》的真實性有所質疑，<sup>25</sup> 但總體而言，宋代理學主要仍是建基於《古文尚書》的，而最為典型的，即是〈大禹謨〉的「十六字心法」。因此，作為程朱理學一派的程晉芳，勢必要面臨這樣的問題：《古文尚書》既然為偽，那麼是否應該廢除？如若廢除，程朱理學的大廈是否亦會隨之坍塌？對此，程氏的回答是：

近儒沈果堂謂是書必不能廢，余獨有取乎其言，以為匪特不能廢，亦不可廢也。<sup>26</sup>

近儒沈冠雲謂：「梅《書》雖偽，終不至廢，學者亦不必慮其廢也。」知言哉！<sup>27</sup>

他讚同沈彤的雖偽而不能廢之說，認定《古文尚書》自有價值，客觀而言，既不會廢，主觀上說，也不應廢。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古文尚書》的經文較為古老：

士生宋明以降，凡六代、三唐詩文小集，片紙隻字，猶或珍襲之，況其

<sup>25</sup> 關於朱熹是否懷疑過《古文尚書》，當代學者多有考辨，如劉人鵬：〈論朱子未嘗疑「古文尚書」為偽作〉，《清華學報》第22卷第4期（1992年12月），頁399；王春林：〈「朱熹疑偽《古文尚書」一說考辨〉，《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8期，頁41-45；姜龍翔：〈朱子疑《古文尚書》再探〉，《嘉大中文學報》第5期（2011年3月），頁129-154。不過，如若回歸歷史現場，大多數清儒仍是認可朱熹曾懷疑過《古文尚書》的，甚至朱熹的信疑儼然成為學者依違《古文尚書》的標桿，亦是迴護《古文尚書》者無法逃避的議題。

<sup>26</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27</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彙輯三代以前嘉言懿訓，聯珠貫璧而出之，而遂視同土苴，可乎？<sup>28</sup>

梅《書》雖後起偽作，自是晉人之書，今人于唐宋人文集且寶貴之，況六朝以上乎！<sup>29</sup>

程氏指出，時人多重視輯佚六朝唐宋的詩文，而《古文尚書》既是梅賾所獻，本身已是「晉人之書」，況且古文中不少段落採自三代佚文，更可寶貴。其次：

孔《傳》雖晚出，而得于周、秦、漢之舊聞者多，數典辨物，中者十之六七。<sup>30</sup>

他表示，偽孔《傳》中的字詞訓詁亦襲自舊註，多是周秦兩漢的名物訓詁，訓解得宜者猶佔大半，並非毫無價值。要而言之，即是要後來者心知晚《書》、孔《傳》之偽，而不以此廢之，僅須辨明今古文、「分別觀之」即可：

伏之與梅，去若霄壤，在今日已為定論，學者固宜分別觀之。<sup>31</sup>

學者要當分別觀之，且不宜與伏《書》相混耳。<sup>32</sup>

（梅《書》）其中嘉言正論頗有來歷，當與伏《書》分別觀之，未可悉棄也。<sup>33</sup>

<sup>28</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29</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sup>30</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715。

<sup>31</sup> 同前註。

<sup>32</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33</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不僅如此，對待主要構築在《古文尚書》基礎上的宋人《書》說，程氏亦主張不可盡廢：

宋人取諸心得，不免武斷之譏，而于漢晉詁訓蔽塞叢結處，亦頗爬梳一二，均未可偏廢也。<sup>34</sup>

由此可見，程氏承認宋人說解固然存在臆斷之處，但漢晉舊註訓詁不通之處，宋儒有時卻反能稍作疏通，其說也應兼採。嗣後他更是在《尚書古文解略》一書中，將這一觀點付諸解經實踐，「因孔、蔡二《傳》，略為去取……而成《解略》六卷」。<sup>35</sup> 誠然，這種兼容今古文《書》、雜採漢宋經說的主張，在乾隆時期顯非主流，大概程氏自己也意識到此說迥異時風，故而在《尚書古文解略》序的結尾，還曾特意向時人與後世無畏地宣告：「後之覽者，或有訾其兼愛，又或□其曲意調停，則弗敢避責矣。」<sup>36</sup> 「兼愛」與「調停」，正是程氏《尚書》學立場極為精當的註腳，為此而獲訾於世，也在他意料之中。或許也正因如此，他的這兩部傾注心血之作，終不免於亡佚，益足證學術之顯晦有時，未易逆料。

#### （四）對具體篇目的一些看法

前述幾點，都是程晉芳對於《尚書》及後世經說的整體認識，而具體到個別篇目上，他亦曾提出過一些看法，其中尤以偽古文的〈泰誓〉、〈說命〉、〈君陳〉為主。對於〈泰誓〉三篇，程氏說：

〈泰誓〉三篇雖非張霸偽書，而以臣訐君，類後世檄文、露布體。湯、

<sup>34</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715。

<sup>35</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36</sup> 同前註。

武並稱，〈湯誓〉、〈牧誓〉，其辭略近，此〈泰誓〉果武王作耶？則武王之志荒矣。<sup>37</sup>

攻梅《書》者，大抵以〈泰誓〉三篇訐詈過甚，與張霸之偽書等。<sup>38</sup>

他認為，〈泰誓〉是武王伐紂時所作的誓詞，但和〈湯誓〉所載商湯伐桀、〈牧誓〉所載武王伐紂時的誓詞不同，〈泰誓〉中的武王語氣不夠和婉，作為臣子，反而對紂王極力詆訐，歷數其「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的暴行，其體酷似後世之檄文。故此，程氏從文體風格出發，主張將〈泰誓〉斷為偽作，甚至在《尚書古文解略》中，他對偽古文各篇均逐一闡釋大意，卻唯有此三篇「僅載白文，弗加詮釋，而於諸家辨駁偽撰之詞，亦弗一載」，<sup>39</sup>大有視〈泰誓〉如偽中之偽的意味。<sup>40</sup>

至於〈說命〉，程氏表示，「尊梅《書》者，則以……〈說命〉三篇有儒家氣象」。<sup>41</sup> 儘管他亦視梅《書》為偽作，但單就〈說命〉而言，他也讚同那些奉古

<sup>37</sup> 同前註。

<sup>38</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sup>39</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40</sup> 關於〈泰誓〉三篇的真偽，可參看朱廷獻：《尚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53-76；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13-225，誠然，由於此篇在今文二十八篇之外，本非伏生所傳，而是漢武帝時河間女子所獻，且馬融就曾有所質疑，因晉唐時人或信東晉梅賾所獻的古文〈泰誓〉，而疑漢代的古文〈泰誓〉，宋人已降即開始質疑東晉古文，認為漢人傳本之可信度既已堪憂，遑論東晉梅賾所獻之本。然而程晉芳的辨偽並未以此為據，而是專就辭氣風格立論，他這種將其他偽古文篇目予以疏釋、唯〈泰誓〉則「僅載白文，弗加詮釋」的區別對待的態度，的確值得玩味。

<sup>41</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文為不偽的人的部分說法，稱此文「氣象矜實，言皆有物」，<sup>42</sup> 足證其《尚書》學觀念之雜採今古、不拘一家。此外，程氏還曾談及偽古文〈君陳〉，認為文中「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一段，「非古君臣質直之道」，而「〈君陳〉以下四篇」，亦即〈君陳〉、〈顧命〉、〈康王之誥〉（以上二篇屬今文〈顧命〉）、〈畢命〉四篇，「皆平熟之言，如出一手」。<sup>43</sup>

根據前引程氏對偽《古文尚書》個別篇目的觀點來看，他多就義理、文風而論，往往因某段話內蘊的氣象或哲理而深表認同，又因某段話的風格不合相應文體，或其語氣不符說話者的身份，輒視為偽作，而鮮能從訓詁、職官、曆法、地理、禮制、史志目錄或他書互見情況等角度進行辨偽。不過，這亦可能只是因為閻若璩、惠棟等人論之已詳，程氏自覺毋庸拾人牙慧，於是刻意迴避而已。不妨參看〈《尚書通議》跋〉中他對程廷祚之說得失的檢討：

其疑「無若丹朱傲」一節，鄙見適同。又論治水先後，于九州之次第見之，可謂一語破的矣。又論〈禹貢〉非專為貢獻而名，辨四海之所包者廣。《洪範議》曰：「在天者，莫大乎五行；在君者，莫大乎五事；在朝廷者，莫大乎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生萬民者，莫大乎庶徵、福、極。」又辨周公未嘗誅管叔；于〈康誥〉「紹聞衣德言」謂為千古聖學之綱領，即〈虞書〉之所謂「稽古」也。又謂成王于周公禮在不臣，家人之禮存焉。而于〈立政〉一篇「常伯、常任、準人」諸官，辨之尤晰；且確十二州、九州因革之故，亦頗詳盡。《通議補》中謂〈多方〉作

<sup>42</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43</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而周人始為政於天下，故繼之以〈立政〉。又謂翼室非居憂之所，初喪，權居於此，至七日而居于先王之殯宮。皆所謂讀書見其大者，近人罕有其匹也。惟以洞庭為九江，此余所未敢從耳。<sup>44</sup>

儘管程廷祚的《尚書通議》與《尚書通議補》二書現已亡佚，我們無由考知其中深得程晉芳認同的論述具體為何，但這篇跋文多多少少提示我們，程晉芳所看重的，不獨有義理為主的申說，如〈洪範〉九疇的層次剖析、「紹聞衣德言」深蘊的儒學精神之類，亦有〈立政〉所涉之官制、十二州與九州之沿革、周公是否誅管叔等問題的討論，足見程晉芳對職官、地理、禮制、史實的考辨絕非一竅不通。

### 三、程晉芳《尚書》類書籍的收藏情況

然而，程晉芳這種今古文並存、漢宋學兼採的《書》學觀，究竟從何而來？也許吾人能從他收藏與閱讀的書籍中，尋得一些端倪。正如前文所言，程氏平生耽好藏書，家藏曾至數萬卷。儘管其藏書目錄《桂宦書目》現已亡佚，<sup>45</sup> 無從

<sup>44</sup> 清·程晉芳：〈《尚書通議》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5，頁778-779。

<sup>45</sup> 王勇曾對程晉芳的著述加以梳理，指出《桂宦書目》今不見傳本，見王勇：〈程晉芳著述考〉。然而張翔稱：「關於程氏桂宦（引者按：原文誤作「宦」，下皆同。）藏書，程晉芳曾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編有《桂宦書目》二卷，後被汪氏《振綺堂書目》收錄，是瞭解程氏藏書的重要資料。」見張翔：〈程晉芳及其桂宦藏書〉，《晉圖學刊》2002年第3期，頁72-73。關於《振綺堂書目》的版本情況，筆者擬另文探討，據目前的初步研究，《振綺堂書目》有三個版本系統，一為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不分卷本（善本書號：14446、01450，後者應為前者的謄清抄本），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凡四十三廚，第一廚為御製各書，第二、三廚為御定各書，第四、五廚為宋元板各書，第六廚為稿本、批校本及家刻本，第七至十三廚為鈔本，其餘均為刻本，且鈔本、刻本兩部分均依四部分類法排序，1927年東方學會鉛印四卷本亦屬此一系統；二為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四卷本（善本書號：16878），半頁九行，全書依四部分類

得知其藏書全貌，但由於四庫館開後，程晉芳亦曾獻上家藏古籍，其中即有不少古籍被《四庫全書》著錄或收入存目。據《四庫採進書目》，「吏部主事程交出書目」中錄有六種圖書，不過這一記載相當不全。<sup>46</sup> 而隨著徵到書籍漸多，乾隆下詔命館臣將進書百種以上者之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以彰各家珍弄資益之善」，<sup>47</sup> 於是在《總目》中，至今尚能看到相當數量的署有「編修程晉芳家藏本」的書籍，吾人亦可藉此略窺程氏藏書之一隅。

在這些署有「編修程晉芳家藏本」的書籍中，頗引起筆者留意的有三部書：閻若璩撰《潛丘筭記》<sup>48</sup> 六卷、陸隴其撰《古文尚書考》一卷與江昱撰《尚書私學》四卷。就清初至中葉的《尚書》學史而言，這三個人恰好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

---

法排序，故分四卷，而各部亦以御撰書居首；三為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顧氏玉笥山房抄本，此本筆者未見，據李雪稱，此本半頁八行，行二十二字，亦依四部分類法排序，但卷首尚有御賜、御題及進呈書目，見楊洪升、李雪：〈新發現的汪氏振綺堂四庫進呈書目〉，《文獻》2017年第1期，頁172-178；李雪：〈論新見汪氏《振綺堂書目》的特點與價值〉，《圖書館學刊》2018年第7期，頁129-134。筆者經眼的前兩個版本系統所錄書籍互有出入，未詳孰先孰後，然均未見《桂宦書目》，不知張翔此說有何根據。此外，湖北省圖書館藏有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壽康抄本，南京圖書館藏有清金石錄十卷人家抄本，遼寧省圖書館藏有清稿本，尚待查考。

<sup>46</sup> 見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184。此六種即《范文正公集》、《忠宣公集》二函十六冊、《王荊公詩註》八本、《忠簡集》二本、《巽齋集》二本、《易象大意存解》一本。又案《總目》著錄之《巽齋文集》為大學士程景伊家藏本，而《易象大意存解》為程晉芳家藏本，但程晉芳入館前為吏部主事，而程景伊此時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且未曾任吏部主事，故可知此「吏部主事程」即程晉芳。

<sup>47</sup> 〈諭內閣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將藏書人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並另編《簡明書目》〉，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28-229。

<sup>48</sup> 因清人避孔子名諱，《潛丘筭記》多寫作「《潛邱筭記》」，今予回改，下同。

### （一）閻若璩的《潛丘劄記》

閻若璩（1639-1704）作為清初的辨偽大家，自然不消多說。他的一部《尚書古文疏證》，從音韻訓詁、天文曆算、輿地沿革等多個角度，對《古文尚書》進行絲絲入扣、鞭辟入裡的反復考辨，幾近系統而徹底地完成了此書的辨偽工作。自此之後，《古文尚書》係偽作之說幾成鐵案，而這部曾佔據中國學術主流逾千載的儒家經典，也終於由信仰的對象變為研究的對象，有清一朝學人對群經乃至群書的辨偽工作，亦就此展開。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將閻氏列於全書之首，視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sup>49</sup> 梁任公譽之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sup>50</sup> 就辨偽之功而論，可謂良有以也。不難看出，程晉芳視《古文尚書》為梅賾偽作，亦是受此種學術思潮的鼓蕩所致，而溯其來源，正是閻若璩的這部代表作。

不過，程晉芳所進獻的，卻並非閻氏的這部代表作。戴君仁曾指出，閻氏之書，「最好的是《尚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二種，其次是《潛丘劄記》」，<sup>51</sup> 而程氏所獻，正是這部《潛丘劄記》。這部札記原由閻氏之孫閻學林整理而成，即乾隆九、十年間眷西堂刻本，其中大都是其早年「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因是未成書稿，又係身後編成，故略顯「漫無體例」，且卷六雜收詩賦，既「非若璩所長」，又不合札記之體，因此嗣後吳玉搢又在閻學林編本的基礎上，重加

<sup>49</sup> 參見清·江藩纂，漆永祥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卷1，《漢學師承記箋釋》，頁38-80。誠然，張舜徽曾指出，閻若璩並非不推尊宋儒，對朱熹亦有迴護，其迂腐之論有時甚至超過黃宗羲、顧炎武輩，江藩推其為漢學開山恐亦失察，見氏著：《清人筆記條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8。然而如論古書辨偽的學術範式與思想解放的時代意義，若璩之功實不可沒。

<sup>50</sup> 梁啟超著，俞國林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六講〈清代經學之建設〉，頁138。

<sup>51</sup> 見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9年），第三章〈閻若璩之生平及著作〉，頁38-44。

刪定，「尚有端緒」，<sup>52</sup> 此吳玉搢重編本，即是程氏所呈。<sup>53</sup> 根據《總目》與《江蘇採輯遺書目錄》來看，當時進呈四庫館的亦有閻學林刻本，係江蘇巡撫所採進者，<sup>54</sup> 而《總目》最終將程氏所獻吳本著錄而將閻本存目，亦足見吳本之精善。

對讀《尚書古文疏證》與《潛丘筮記》可以發現，二書多有互見之處，尤引人注目的是《總目》所舉的《疏證》卷六第八十二條，在論及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不入食限之前，閻氏即明言：「《潛丘筮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sup>55</sup> 亦即此說首見於《潛丘筮記》，閻氏恐其不能傳世，故又補入《尚書古文疏證》。無獨有偶，《疏證》卷七第一百七條論書契造於伏羲抑或黃帝時，閻氏又云：「《潛

<sup>52</sup> 清·永瑢、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19 子部雜家類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3 冊，頁 591，底本係清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武英殿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四卷，以下簡稱「殿本」。又見清·永瑢等撰，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030，底本係清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首一卷，以下簡稱「浙本」。又見清·永瑢、紀昀等撰：《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第 4 冊，頁 605-607，以下簡稱「津圖紀稿」。又見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年），頁 556，以下簡稱「文溯閣本」。又見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第 3 冊子部十，頁 492 下-493 下，以下簡稱「文津閣本」。又見清·閻若璩撰：《潛丘筮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859 冊，頁 382 下，以下簡稱「文淵閣本」。不過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文淵閣本均無「考證經籍隨筆筮記之文」一句。

<sup>53</sup> 程晉芳《勉行堂詩集》中有〈留別吳丈山夫〉一首，且〈懷人詩〉十八首之十五即懷吳玉搢之作，可知吳玉搢與程晉芳亦有交遊，則此吳玉搢重編本或係吳氏所贈，復由程氏進呈四庫館。

<sup>54</sup> 別本《潛丘筮記》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提要云：「此本乃其孫學林所編。」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26 子部雜家類存目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 冊，頁 730-731。《江蘇採輯遺書目錄》亦云此本「並附書策詩賦」，亦可知江蘇巡撫採進本為閻學林編本。見清·黃烈編：《江蘇採輯遺書目錄》，收入張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第 4 冊，頁 327，底本係清歸安姚覲元咫進齋綠絲欄抄本。

<sup>55</sup> 見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6 上，頁 347。此條在閻書第八十二條，提要誤作「八十一條」。

丘筍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sup>56</sup> 由此可見，二書內容、觀點有所重疊，均涉及對《古文尚書》的考辨。因此，上文所述的程晉芳對《古文尚書》係梅賾偽作的基本認識，如若溯其淵源，那麼閻若璩的這些以《尚書古文疏證》與《潛丘筍記》二書為代表的辨偽成果的影響，自然不容忽視。

## (二) 陸隴其的《古文尚書考》

其次說陸隴其(1630-1693)。陸氏字稼書，平湖人，他本是道學家，曾被唐鑑譽為有清傳道四儒之一，<sup>57</sup> 而《書目答問》後附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亦將其列入「程朱之學」一派的「理學家」。<sup>58</sup> 他對《古文尚書》的看法，主要保留在《古文尚書考》一書中，此書原在《三魚堂集》內，至曹溶編《學海類編》時始摘出別行，《總目》稱程晉芳曾進呈《學海類編》一部，又進呈陸氏《古文尚書考》一種，則程氏所獻當即《學海類編》本。<sup>59</sup> 在此書中，陸氏明

<sup>56</sup> 見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7，頁571。

<sup>57</sup> 關於陸氏的生平及《尚書》學觀點，可參見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七章〈《晚書》公案的餘波〉及附錄四〈疑辨《晚書》各家姓氏表〉，頁176、325。

<sup>58</sup>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徐鵬導讀：《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63。

<sup>59</sup> 不獨此書，《總目》著錄或存目的「編修程晉芳家藏本」中，有不少書應當都是《學海類編》本。據筆者初步考察，除《古文尚書考》之外，《總目》所收程晉芳家藏《學海類編》本的圖書還有七十種，即王崇慶《周易議卦》、程大昌《詩論》、陳子龍《詩問略》、舊題鄭樵《禮經奧旨》、舊題洪遵《訂正史記真本凡例》、方勺《青溪寇軌》、舊題王稱《張邦昌事略》與《西夏事略》、舊題石延年《十六國考鏡》、陳元靚《歲時廣記》、薛尚質《常熟水論》、孫宗彝《治水要議》、姜宸英《江防總論》與《海防總論》、舊題黃淳耀《山左筆談》、舊題項惟貞《燕臺筆錄》、王士性《黔志》與《豫志》、楊億《歷代銓政要略》、舊題陳彭年《貢舉敘略》、董其昌《學科考略》、舊題李維《邦計彙編》、舊題歐陽玄《拯荒事略》、舊題危素《元海運志》、舊題邱濬《鹽法考略》與《錢法纂要》、舊題倪元璐《國賦紀略》、舊題曹溶《明漕運志》、黃宗羲《歷代甲子考》、佚名《傳習錄略》、崔銑《後渠庸書》、湛若水《甘泉新論》、王艮《心齋約言》、陸隴其《學術辨》、徐乾學《教習堂條約》、舊題劉筠《刑法敘略》、陳士鏞《折獄卮言》、譚瑄《續刑法敘略》、《沈氏農書》、郭翼《雪履齋筆記》、王禕《青岩叢錄》、岳

確表示，《古文尚書》非偽作，而其主要論據則是朱熹對門人輔廣講的一番話：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sup>60</sup>

陸氏據此孤證就推斷說，「朱子於《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sup>61</sup> 對此，四庫館臣曾舉出《朱子語錄》中疑辨古文的三處段落作為反證，並批評道：「朱子辨古文非真，不一而足，未可據輔廣所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sup>62</sup> 戴君仁亦讚同館臣此說，進而略帶微詞地說：「陸氏此《考》很平庸，

---

正《類博雜言》、《空同子纂》、佚名《木筆雜抄》、舊題太平老人《袖中錦》、舊題俞琰《月下偶談》、陸瑛《簞齋雜著》、舊題蘇軾《格物粗談》、沈德符《飛鳧語略》、陸深《儼山外紀》、佚名《朝野遺記》、佚名《東園友聞》、佚名《拊掌錄》、俞琬《爐火鑒戒錄》、舊題丘處機《攝生消息論》、舊題冷謙《修齡要指》、舊題釋文瑩《玉壺詩話》、《吳氏詩話》、《東坡詩話》、舊題何孟春《餘冬詩話》、舊題王世貞《全唐詩說》、李日華《恬志堂詩話》、舊題陳繼儒《佘山詩話》、舊題胡震亨《唐詩談叢》、陳維崧《四六金針》、談遷《棗林藝簞》、宋荦《漫堂說詩》、舊題張炎《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舊題涵虛子《詞品》。另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翁覃谿先生書學海類編目錄》二冊（館藏書號：17187），其中多載「汪氏藏本」與「程氏藏本」之異同，此「程氏藏本」極可能就是程晉芳進呈的家藏本，可知此二冊目錄當是翁方綱在館獲睹程本時所抄，且當時進呈四庫館的《學海類編》應有兩部。然而《學海類編》卷帙甚夥，現存印本至早僅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本，可能此書在乾隆朝及之前未曾付梓，儘管館臣在提要中屢屢批評其改竄、作偽的問題，稱是「書賈」所為，但慮及目前已知的版本情況，尚不能斷言四庫館所採進者係刻本，此一問題尚待進一步探索。

<sup>60</sup> 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78，頁1981。

<sup>61</sup> 清·陸隴其：〈書《古文尚書考》後〉，見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25冊，頁11上。

<sup>62</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經部書類存目二，第1冊，頁311上；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114下；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421。

我們只是在這裡窺見道學家之苦心而已。」<sup>63</sup> 此言得之。

正如第一節所言，程晉芳以《古文尚書》為梅賾偽作，自與陸氏異趣，然而綜觀程氏的文集，也可看到他並非完全否定陸隴其的道德學問。在〈正學論〉中他曾指出，「儒者」重在「內治其心，外治其事」的道德事功，「學人」重在「旁搜博覽，靡所不通」的學問見識，能將二者「合而為一」者乃是「大儒」，可惜「世不多覩」，「國朝以來」足稱大儒之名的，就只有湯斌、陸隴其與楊名時三人，他還認為陸氏的「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而唯一的不足，只是「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而已。<sup>64</sup> 可見，儘管在對《古文尚書》的認識上，程晉芳固然無法苟同陸隴其的意見，但在為人治學的方面，他對陸氏還是相當推重的，而收藏並進呈陸氏的著作，大抵也源於此。

### （三）江昱的《尚書私學》

最後再說江昱（1706-1775）。江氏字賓谷，號松泉，江都人。<sup>65</sup> 與前兩位在《尚書》學史上頗具代表性的名家相比，江昱的名氣顯然要小了許多，不過他和同時代的另一位疑辨古文的名家程廷祚多有來往，兩人曾激辯古文真偽，乃至廢寢忘食。從大的陣營分劃上來講，江氏與陸隴其一樣，都主張《古文尚書》非偽，不過在具體的論證角度上，二人又微有不同。據其所撰《尚書私學》四卷來看，他之篤信《古文尚書》為真，同樣無堅實證據，《四庫總目》即稱：

<sup>63</sup> 見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第十章〈繼毛衛古及偽古文的價值〉，頁 160-161。此外，古國順、林慶彰亦有類似《總目》的觀點，見古國順：《清代尚書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偽古文尚書之辯護〉第二節〈一同毛氏辯護古文之諸家〉第一小節，頁 99；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四章〈考辨《古文尚書》〉，頁 240。

<sup>64</sup> 清·程晉芳：〈正學論五〉，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 1，頁 695。

<sup>65</sup> 關於江氏的生平，可參見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附錄四〈疑辨《晚書》各家姓氏表〉，頁 332-333。

是書大旨謂《古文尚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意斷。<sup>66</sup>

如果說陸氏的辯駁是折中於朱子的疑信，那麼江氏則是有意折中於聖人了。從《四庫總目》的這段引述中即能看出，江氏只是認為《古文尚書》所含蘊的至理唯有聖人能夠道出，其辯駁亦非學理的討論，僅僅基於義理的醇正。因而劉起鈞就批評道：「顯然這是從對經學的信仰而不是從對文獻的考辨來擁護偽孔，這點幾乎成了擁偽孔者的共性。」<sup>67</sup> 無論是折中於朱子，抑或折中於聖人，歸根到底，確是源於一種「對經學的信仰」，劉氏此語，可謂一針見血。

誠然，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僅能推知程晉芳曾研讀過《潛丘筭記》卷四補正顧炎武《日知錄》的部分，<sup>68</sup> 甚至可能也曾通讀全書，但陸隴其與江昱二書，則尚不能確知程氏是否曾經參讀，此二書對其《尚書》學觀點是否產生影響，亦未可知，尤其是江昱的《尚書私學》，極有可能是程氏出於故誼而進呈此書，以祈表彰亡友，或許沒有學術上的考量（詳第五節）。不過，我們也應認識到，程氏藏書之多，想必為他的閱讀、研究與寫作帶來了諸種便利。單從他進呈的書目即可推知，他的藏書既有主張古文為偽之書，也有主張古文非偽之書，足見他購藏圖籍，同樣包容開放，能夠廣納眾說，而不專主一家，則其兼容今古、雜採漢宋的《尚書》學觀念，亦當與這種藏書趣向頗有關聯。

<sup>66</sup> 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卷14經部書類存目二，頁118中；又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頁319下；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455。「據理意斷」，殿本作「據理以斷」，津圖紀稿作「據理臆斷」，浙本與津圖紀稿義勝，此從浙本。

<sup>67</sup> 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八章〈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頁376。

<sup>68</sup> 程晉芳〈讀《日知錄》〉云：「太原閻伯詩有〈補正《日知錄》〉一卷，所見者猶小。」見清·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4，《勉行堂詩文集》，頁770。所謂「〈補正《日知錄》〉一卷」正在《潛丘筭記》中，閻學林、吳玉搢二本均繫於卷4，可知程氏當參讀過這一部分。

#### 四、程晉芳的閱讀視野與其入四庫館經歷之關係

若果爬梳程晉芳一生的學術活動，可以發現，諸經之中，他於《尚書》確實用力最深，單單一部《尚書今文釋義》，自「丁亥（1767）、戊子（1768）間」動念著書，前後四易其稿，歷時十餘年，直至「辛丑（1781）初夏」始成書，足見他對此事頗為重視。在編纂《尚書今文釋義》與《尚書古文解略》的這十幾年當中，他也確實將兼採漢宋、不主一家的經學理念付諸實踐，因此，他著書往往都會「參以別家之說」，「取諸家註釋，擇其尤者」，而他的書之所以能做到廣納眾說，和他本人的博覽亦是分不開的，其閱讀視野實值探究。

的確，這裡存在一種可能性，亦即前述《總目》著錄或存目的三部書固然為程氏進呈，但除《潛丘筮記》之外，程氏興許未曾通讀，遑論受其影響。更有甚者，《總目》中底本為「編修程晉芳家藏本」的書籍，與《勉行堂文集》中程氏撰有題跋的各書，竟然無一重合，換言之，程氏進呈四庫館的絕大多數書籍，吾人無由知曉他是否曾經遍覽。慮及這一點，我們或許還應回歸前述那五篇談及《尚書》的文章，起碼文中所稱引的《尚書》類書籍，當係程氏確曾經眼且頗為重視的，而藉此庶幾有望復原其《尚書》學之閱讀視野。

##### （一）四庫館外的《尚書》學閱讀視野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作為當時士子應舉的必讀書，又是宋代《尚書》學的標誌性著作，蔡沈的《書集傳》程氏必曾精讀，<sup>69</sup> 而這亦可與前文對其崇宋抑漢

<sup>69</sup> 據《清史稿·選舉志三》，順治二年（1645）頒《科場條例》，「《書》主蔡《傳》，見清·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108，頁3148。而康熙六十一年（1722）敕修《欽定書經傳說彙纂》，雍正八年（1730）

之風的剖析兩相印證。又如〈《尚書古文解略》序〉所言，他既然能「因孔、蔡二《傳》，略為去取」，其時通行本《尚書注疏》中的偽孔《傳》想必同樣是他所熟稔的。

其次，程晉芳特為程廷祚《晚書訂疑》、《尚書通議》和盛百二《尚書釋天》撰寫序跋，審其辭氣，絕非未經通讀所能為，尤其是《尚書通議》一書，程晉芳一一臚列其觀點得失，並坦言：「余壬午（1762）赴京師，先生手此以畀余，余略檢一遍。越十一年，治《尚書》，始詳讀之。」<sup>70</sup> 足見他讀此書當不下兩遍。況且程廷祚係程晉芳的族叔，《蒲褐山房詩話》稱程晉芳「少問經義於從叔廷祚」，<sup>71</sup> 亦即二人早就相識，而程廷祚的《尚書》學觀點也理應早已為程晉芳所知，不必待後者讀《尚書通議》時纔受其啟發。

另外，像程晉芳梳理清初《古文尚書》辨偽的學術史時，提到的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想必也是他參讀過的。

通觀前述幾種《尚書》類書籍，《尚書注疏》與蔡沈《書集傳》顯係程氏早年所讀，程廷祚《晚書訂疑》則為乾隆二十七年（1762）時獲贈，均非入館後所閱；閻若璩《潛丘筭記》既係程氏進呈，可以推知他或許對閻氏著作較為關注，閱讀《尚書古文疏證》可能亦在入館之前；而程氏所讀的盛百二《尚書釋天》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城書院刻本，自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館之後所讀，但《四庫採進書目》未有此書進呈四庫館的明確記載，可能是程氏於館外所得；至於他所進呈的陸隴其、江昱之書，既是私家奔藏，自不必入四庫館之後始得寓目。可見，除了惠棟《古文尚書考》未曾進呈四庫館、其閱讀時間尚難確定之外，

告成，「仍以蔡《傳》居前」（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2 經部書類二，第1冊，頁280）。可知在程晉芳的時代，科舉仍以《書集傳》為準。

<sup>70</sup> 清·程晉芳：〈《尚書通議》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78-779。

<sup>71</sup> 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清稿本），卷53，頁1a。

以上所論基本上是程晉芳在四庫館外的《尚書》類書籍的閱讀情況，亦主要是他進入四庫館之前的學術背景。

## (二) 入四庫館經歷的學術影響

然而，如若僅局限於前述區區幾家而已，程晉芳的眼界絕難如此開闊，數萬卷的私人藏書中，《尚書》學著作想必也不會太多，顯然都遠不能滿足程氏的好學之心，而真正擴大其閱讀視野的，還是要從入四庫館任總目協勘官開始算起。在《勉行堂文集》中，程氏就屢次感慨自己搜尋某書累年不得、終在四庫館中獲睹的經歷：

德州盧雅雨……遂為刊行（按：指《唐摭言》），讎校未極精，與初本互有得失。余承乏為四庫全書纂修，得黃氏鈔本，與盧刻對勘，存其一是。

72

余與馬氏有姻，因借鈔，不能得也。癸巳（1773）之春，設四庫全書館，馬氏書大半進館中，余乃得見之矣。<sup>73</sup>

既乃得梨洲《易學象數論》……然求難弟之書（按：指黃宗羲之弟黃宗炎《圖學辨惑》），竟不可得。乾隆乙未（1775），始於浙省所進遺書中見之。<sup>74</sup>

余求其書（按：指《唐律疏義》）二十年不可得，最後始於四庫館見之。

75

<sup>72</sup> 清·程晉芳：〈《唐摭言》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8。

<sup>73</sup> 清·程晉芳：〈書《春秋分記》後〉，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4，頁763。

<sup>74</sup> 清·程晉芳：〈《圖學辨惑》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5，頁776。

<sup>75</sup> 清·程晉芳：〈《唐律疏義》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5，頁784。

這些表述無不透顯出，程氏入四庫館的經歷對其閱讀視野的拓展著實大有助益，甚至藏家秘不示人的珍貴版本，與二十載念茲在茲的稀見之書，也因四庫館的徵書而得以寓目。類似地，在《尚書》學研究上，他入館之後也獲益甚多。在〈《尚書今文釋義》序〉中，程氏自陳此書頗為曲折的編纂過程，就與他入四庫館有關：

丁亥（1767）、戊子（1768）間，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取諸家註釋，擇其尤者，次第著于篇。凡五載，而第一稿成。癸巳（1773）之夏，從事四庫書，所見書益多，重加哀輯，三年（1776）而第二稿成。又三年（1779）增刪改易，第三稿成，而余年已六十餘矣。<sup>76</sup>

可以看出，在程氏的自述中，恰恰是因為進入四庫館，參與編纂《四庫全書》，他纔得以博覽全國各地進呈的海量圖籍，而看到更多的前人註解，有了更多的思考，又反過來敦促他對初稿重加哀輯，再度修訂，終於歷時三年而第二稿始成，此時乃敢自承「治《尚書》漸有端緒」。<sup>77</sup> 據此確可推知，當時四庫館所採進的《尚書》類書籍中，當有不少是曾經程氏之眼的，甚至曾予程氏以某種啟發。更可留意的是，據程氏〈《尚書今文釋義》序〉中的自述，早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十三年（1768）之間，他便「取伏《書》反復讀之，意若有會」，並已著手編纂《尚書今文釋義》，而到了〈《尚書通議》跋〉中，當他回顧自己研治《尚書》的經歷時，卻說：

余壬午赴京師，先生手此以畀余，余略檢一遍。越十一年，治《尚書》，

<sup>76</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715。

<sup>77</sup> 程晉芳〈《春秋左傳翼疏》序〉：「丙申（1776）之秋，治《尚書》漸有端緒。」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8。

始詳讀之，為識其要于末云。<sup>78</sup>

所謂「壬午赴京師」，即是他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舉後北上一事，其時程廷祚曾贈他一部《尚書通議》，他草草翻檢一過，而直到「越十一年」，亦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自稱此時開始「治《尚書》」，纔仔細重讀此書。然而這一說法卻與《尚書今文釋義》序頗有齟齬，既然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間他就已經開始研讀《尚書》，何以又謂乾隆三十八年纔「治《尚書》」呢？筆者認為，實際上，這個始治《尚書》的時間，正是他入四庫館而得以博覽《尚書》類書籍的時間。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有意重構了其《尚書》學研究的起點，將入四庫館與之聯繫起來，亦可表明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對其《尚書》學研究的幫助之大、影響之深。

### （三）沈彤《果堂集》的影響

可惜的是，關於程晉芳進四庫館之後的閱讀情況，存世資料相當匱乏，其詩集所收詩作的寫作時間下限為「壬辰六月」，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均在四庫館開之前，而文集中雖有作於入四庫館後的篇目，但涉及《尚書》學的也僅有前引五篇而已。不過，在這五篇文章中，程氏兩度徵引了沈彤的表述，這一點可能頗值重視。如上文所論，程氏所引的沈彤之語，一言「是書（按：指《古文尚書》）必不能廢」，一言「梅《書》雖偽，終不至廢，學者亦不必慮其廢也」，一略一詳，大旨皆謂《古文尚書》自有價值，客觀而言，不存在廢絕的可能，主觀而言，也不必考慮廢絕的做法。那麼沈彤對於《尚書》究竟又有何認知？

沈彤（1688-1752），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主要以三《禮》研究聞名，而《尚書》學著作僅有《尚書小疏》一卷。或許也是這個緣故，論者對其《尚書》

<sup>78</sup> 清·程晉芳：《尚書通議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78-779。

研究罕有關注，如吳通福的〈疑辨《晚書》各家姓氏表〉在沈彤著述中，即失收《尚書小疏》一書，<sup>79</sup> 此外著重討論其《尚書》研究的，管見所及，僅有古國順《清代尚書學》第六章第三節的第一小節以及鍾雲瑞〈清代沈彤《尚書》學研究〉一文。<sup>80</sup> 古氏此書中涉及沈彤的篇幅並不長，但稱沈氏「其學不偏主漢宋」，且「不信後出古文」，已頗得其精要。鍾文內容較詳，他基於沈氏為惠棟《古文尚書考》所作的序以及〈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亦認為沈氏的基本立場是反駁毛奇齡，並視古文為偽作。然而筆者認為，古、鍾二氏興許都忽視了《果堂集》中沈氏為《古文尚書冤詞》作的另一則題跋，亦即〈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而正是這篇題跋，纔引起了程晉芳的共鳴。在這篇題跋中，沈彤這樣講道：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為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古文尚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真古文之殘編賸簡，如《隋志》所載《尚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真古文之要領，以深悉其偽，則其學彌粹，其信彌篤。李文貞，近世之大儒，其言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夫大儒而信之如此，則不信者罕矣。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

<sup>79</sup> 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附錄四〈疑辨《晚書》各家姓氏表〉，頁310。

<sup>80</sup> 古國順：《清代尚書學》，第六章〈漢宋兼宗之尚書學〉第三節〈乾嘉時期諸家〉第一小節，頁196；鍾雲瑞：〈清代沈彤《尚書》學研究〉（「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會議論文，江蘇：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圖書館，2019年6月1-2日），頁1060-1066。

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以為非董、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志於修身行政，尚孳孳取為師法，況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決之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真偽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sup>81</sup>

不得不承認，沈氏此文的态度著實令人驚異。他固然讚同《古文尚書》係偽作之說，但又引道學家李光地捍衛古文之說，認為偽古文必不會就此廢絕，而其根據竟是書中承載了聖人之道，義理醇正，足資取法，這與那些強調《古文尚書》亦有價值者的論調，幾乎如出一轍。因此，更準確地說，沈氏在《古文尚書》真偽問題上的立場，是雖偽而不能廢，故而《果堂集》卷五的〈《古文尚書考》序〉、卷八的〈書《古文尚書冤詞》後〉和〈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這三篇文章，也應該合而觀之，不可偏廢。

然而在程晉芳的時代，主張古文雖偽而不能廢的聲音倒也不乏其人，譬如莊存與，他大約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入值上書房時即極力反對廢除《古文尚書》，主張超越真偽之辨，轉而講求書中的微言大義，以期經世致用，並基於這一認識，著手編撰《尚書既見》，<sup>82</sup> 程氏何以不曾引莊存與為同調呢？況且沈氏既以三《禮》研究著稱，其《尚書》研究亦屢受矚目，則程晉芳又從何讀到沈彤此跋？儘管沈氏長程氏不過三十歲，二人時代亦可相及，但縱覽程氏及其友人的詩文，尚未發現程、沈二人有所往來的記載，可知沈彤之說，並不是程氏通過學術交流得來的，而很可能源於閱讀。而查檢《總目》及《四庫採進書目》等書，

<sup>81</sup> 沈彤：〈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果堂集》（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卷8，頁5a-5b。

<sup>82</sup> 關於莊存與的《尚書》學，可參看郭曉東：〈略論莊存與的經學思想：以莊氏《春秋》學為討論中心〉，《經學、政治與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34-170；賴志偉：〈莊存與的《尚書》研究：對《尚書既見》的新解讀與新看法〉，《原道》第28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頁145-157。

亦沒有程晉芳入四庫館前曾藏有沈彤著作的跡象。故此，筆者推測，程氏所讀的〈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一文，興許正是出自江蘇巡撫採進四庫館的這部《果堂集》刻本。<sup>83</sup>

耐人尋味的是，程晉芳在轉引沈氏之說時，既不是取自《尚書小疏》，也不是取自《果堂集》中所收的〈《古文尚書考》序〉或〈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二文，而是恰恰用了同卷〈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中的《古文尚書》「必不能廢」的觀點，甚至先後在序跋中兩度引述此說，這種有意識的選取也意味著，程氏對沈氏的這一觀點最為認同，可以推想，程氏這種兼容今古的《尚書》學觀念，亦極有可能導源於沈彤。

## 五、程晉芳的交遊對其《尚書》學觀念的影響

前文業已論及，程晉芳平生好交遊，與考據、文章之士多有來往，且喜獎掖後進。<sup>84</sup> 早年在江南時，他與袁枚、杭世駿、吳玉搢、吳敬梓等人已有詩歌酬唱，入京之後，又從朱筠、戴震學，亦曾結交翁方綱、趙翼、蔣士銓、錢載等人，故而袁枚即譽之曰「交滿海內」。甚至當程氏過世之後，京中還有人感慨道：「自

<sup>83</sup> 《總目》著錄有《果堂集》十二卷，係「江蘇巡撫採進本」，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73 集部別集類二十六，第 4 冊，頁 602 上。《江蘇省第二次書目》亦載有《果堂集》二本，見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頁 32。而《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則云「此集詩文共十二卷，刊本」，見清·黃烈編：《江蘇採輯遺書目錄》，收入張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 4 冊，頁 499。《果堂集》十二卷現有清乾隆刻本傳世，或即與四庫館所採進者為同版。

<sup>84</sup> 關於程晉芳的交遊，可以參看程治國：《程晉芳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四章〈程晉芳的交遊〉，頁 53-73。關於程晉芳與袁枚的交遊，可以參看魏世民：〈論程晉芳與袁枚的交誼和學術往來〉，《徽學》第 8 卷（合肥：黃山書社，2013 年 12 月），頁 304-311。關於程晉芳與翁方綱的交遊及二人學術趣向之異同，可以參看曹美秀：〈程晉芳與翁方綱之交遊與論學〉，《文與哲》第 36 期（2020 年 6 月），頁 257-310。

竹君先生（按：即朱筠。）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sup>85</sup> 因此，程氏的《尚書》研究，或許與其交遊亦不無關係。前文就已提到，程氏吸收了閻若璩一派對《古文尚書》的辨偽意見，而吳玉搢重編的閻若璩著作——《潛丘筭記》一書——可能正是吳氏贈予程氏的，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則尚有江昱與程廷祚二人。

### （一）江昱的影響

江昱其人，前已述及，程氏向四庫館進呈諸書之中，即有他的《尚書私學》一書。不僅如此，通觀《總目》可以發現，《總目》收錄與存目的江昱著作，除《尚書私學》四卷外，尚有《韻岐》四卷、《瀟湘聽雨錄》八卷、《松泉詩集》六卷這三種書，而以上四種書無一例外，均來自「編修程晉芳家藏書」。更有甚者，《總目》中還收入了陳珮的《閨房集》一卷，亦是「編修程晉芳家藏書」，而陳珮，正是江昱的妻子。

由上文可知，江昱的《尚書》學觀念是有意捍衛古文、不視為偽的，甚至頗有些「對經學的信仰」色彩，但程氏不僅將他的《尚書私學》進呈四庫館，而且還將他的其他著作，乃至他妻子的著作也一併進呈，則顯然不獨由於學術的考量，更是出於私誼了。關於江氏與程氏的交遊，傳世資料尚罕，而《勉行堂詩集》有數首詩提及與「松泉」玩賞搨本、雅集分韻之事，<sup>86</sup> 則二人當是翰墨之交，且此集卷五還收有一首題為〈寄江松泉表丈〉的七言古詩，<sup>87</sup> 程氏既以「表丈」、

<sup>85</sup> 清·袁枚：〈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誌銘〉，見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附錄〉，頁 847-849；亦見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 26，頁 292 上。

<sup>86</sup> 如卷 22 之〈同玉井、沃田、松泉、斗初、漁川、江皋、松滋集對琴新居，分得「以」字〉、〈題江七丈松泉、九丈蔗畦所搨劉莘老石鼓山題名後〉、卷 23 之〈六月七日招同玉井、學子、松泉、棕亭、鷺川、耦生湖上納涼，分得「添」字〉等，見《勉行堂詩文集》，頁 561、577、581。

<sup>87</sup> 清·程晉芳：〈寄江松泉表丈〉，見《勉行堂詩集》，《勉行堂詩文集》，卷 5，頁 153。

「江七丈」稱之，可知二人尚有親緣關係。

更須注意的是，江昱卒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十，<sup>88</sup> 則程氏於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館時，江昱尚在人世，而《四庫全書》收書傾向之一，即是存者之書少予著錄，故而江氏著作經程氏進呈而被《四庫全書》收錄，可能是在乾隆四十年江氏過世之後。換言之，在江昱身後不久，程晉芳即將家中所藏江氏及其妻子的著作進呈四庫館，以期讓這位故交兼親戚名登冊府，此舉誠可謂用心良苦。

當然，在故友身後為其董理遺著，甚或代為進獻茂陵遺稿，俾廣流傳，自古以來常例皆爾，不過程晉芳所獻的卻並非珍本秘藏之類的稿抄本，而大多是業經梓行的刻本。上文已經論及，程氏進呈的家藏本中，《潛丘劄記》當係吳玉搢重編本，《古文尚書考》當係《學海類編》本，從現存版本情況來看，猶不能斷定是刻本抑或抄本；但是可以明確的是，陳珮《閨房集》一書有清刻本存世，儘管其刊刻時間不詳，但極可能刻於江昱過世之前，<sup>89</sup> 程氏所獻或即此本；而江昱的四部著作，更是在四庫館開多年之前就已刊行。特別是《松泉詩集》，《總目》明言「是集即刻於湖南者也」，<sup>90</sup> 則館臣所見應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

<sup>88</sup> 《清史列傳》卷 71〈江昱傳〉稱他「乾隆四十年卒，年七十歲」，見清·佚名撰，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71，頁 5854。

<sup>89</sup> 此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閨房集》，半頁十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無牌記，係雍正六年（1728）二月初一日陳珮過世後由親友所編，書前有徐惠音序，書後附錄有唐建中〈江賓谷元配陳孺人傳〉、方求愉〈江賓谷元配陳夫人誄〉與江昱〈亡妻陳君墓碣〉及諸名媛挽詩，且江文云：「雍正……十年三月望日，葬於天長縣北雁落堆。」（附錄，頁 5a），可知刊刻時間當不早於雍正十年（1732）。筆者粗檢一過，書中「絃」字凡兩見，一字闕末筆（頁 4b）、一字不闕末筆（頁 9a），「胤」字凡一見，且闕末筆（附錄頁 5b），「寧」字凡六見，均不避諱，亦可驗證此本應刻於雍正十年至嘉慶之間。況且揆其情理，此本應是陳珮過世後、江昱尚在世時所刻，則刊刻時間當不晚於乾隆四十年（1775）。儘管乾隆名諱的避諱情況不詳，無法斷定是雍正刻本還是乾隆刻本，但基本可以斷言此本應刻於程氏入四庫館之前。

<sup>90</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85 集部別集類存目十二，第 4 冊，頁 950 下。

小東軒刻本，至於其他三種，既然在程晉芳入館前均已刊刻，<sup>91</sup> 可以推測程氏所呈的江、陳二氏遺著，理應同是刻本，而不是未付剞劂、私下流傳的稿抄本。

不過，總體來看，江昱此種迴護《古文尚書》的學術立場並不為程晉芳所認同，亦未影響及程氏。儘管程晉芳對這位亡友頗為照拂，但就《尚書》學而言，他似乎受江氏的影響較小，若論交遊上的影響，大抵程廷祚的反而要稍多一些。

## （二）程廷祚的影響

程廷祚（1691-1767），字啟生，號綿莊，上元人，少時見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後刪定為《晚書訂疑》三卷，進而足成《尚書通議》二十八卷、《尚書通議補》二卷。<sup>92</sup> 就清代《尚書》學史的譜系來看，他可謂是《古文尚書》辨偽一派的中堅力量，不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的觀點與閻若璩、惠棟亦有參差，特別是他主張漢代古文無二十四篇、梅賾無獻書之事、晚出《古文尚書》出於劉宋元嘉之後，均與主流的漢學學者頗不一樣。對於這三個觀點，馬雍、戴君仁均表認同，而劉起鈞則對後兩說予以反駁。<sup>93</sup> 或許正因程廷祚的觀點不盡同於閻、惠二氏，論者在談及清前期的《尚書》辨偽史時，一般也僅列閻氏、惠氏，鮮及程氏，而將程廷祚提升到與閻氏、惠氏並稱的地位，實昉自程晉芳。在《晚書訂疑》後序中，程晉芳即在力辨古文之偽的閻若璩、

<sup>91</sup> 根據目前已有的版本著錄來看，《尚書私學》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韻岐》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湘東署齋刻本，《瀟湘聽雨錄》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草軒刻本。

<sup>92</sup> 關於綿莊的生平及學術觀點，可參看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第七章〈《晚書》公案的餘波〉及附錄四〈疑辨《晚書》各家姓氏表〉，頁 165-170；蔣善國：《尚書綜述》，頁 294-295；古國順：《清代尚書學》，第二章〈偽古文尚書之辨證〉第四節〈踵繼閻氏之諸家〉第四小節，頁 70-72。

<sup>93</sup> 馬雍之說，參見馬雍：《尚書史話》，《古代要籍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69。戴君仁之論，見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第九章〈閻氏之繼起者〉，頁 137-138。劉起鈞之說，則參見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第八章〈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頁 365-366。

惠棟兩家之後，補上了程廷祚：

國朝諸儒……力辨梅氏《古文尚書》之偽，其尤明晰不可奪者，閻伯詩之《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之《古文尚書考》；佐之者，家綿莊之《晚書訂疑》也。<sup>94</sup>

所謂「佐之」，用程晉芳的話來說，就是「于閻、惠兩家之外，別闢門徑，而足以補所未及」，<sup>95</sup> 而在辨偽方法上，三家實則相差不遠，亦即：

閻氏、惠氏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來。綿莊亦類是。<sup>96</sup>

而在〈《尚書古文解略》序〉中，程晉芳則直接將三人並稱，並按年齒將程廷祚置於惠棟之前：

梅氏晚出書……我朝閻伯詩、程綿莊、惠定宇輩出，始抉摘無遺蘊。<sup>97</sup>

儘管論年齒，程廷祚長於惠棟六歲，但惠棟的《古文尚書考》成書於雍正十二年（1734），<sup>98</sup> 而程廷祚的代表作《晚書訂疑》則大約成書於乾隆十七年（1752），

<sup>94</sup> 清·程晉芳：〈《晚書訂疑》後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37-738。

<sup>95</sup> 同前註。

<sup>96</sup> 同前註。

<sup>97</sup> 清·程晉芳：〈《尚書古文解略》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5-716。

<sup>98</sup> 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上曾說：「甲寅（1734）夏秋間，偶校九經注疏，作……共為一卷……藏篋衍數年矣。癸亥（1743）春，於友人許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予先後印合。」則惠書上卷的主要部分成於雍正十二年（1734）。吳通福亦主雍正十二年說，但未予論證，見氏著《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第四章〈《尚書古文疏證》對《晚書》的考辨〉，頁103。古國順則認為惠書成於乾隆十五年（1750），當係受到沈彤〈《古文尚書考》序〉末所署「乾隆十五年歲次上章」的誤導，見氏著《清代尚書學》，第二章〈偽古文尚書之辨證〉第四節〈踵繼閻氏之諸家〉第一小節，頁67。不過無論是哪種說法，其成書時間均早於《晚書訂疑》。

<sup>99</sup> 若就此二人辨偽代表作的成書時間而言，置程廷祚於惠棟之前，可能不止有年齒的因素，亦能折射出程晉芳終其一生對乃師的崇敬心理。如前文所引，程晉芳少時即「問經義」於程廷祚，而當他治學已小有成績、《尚書今文釋義》業經成書時，他依舊謙遜地表示：

余禱昧寡學，何足以窺聖籍之淵深？然幼時幸從篤古者遊，側聞緒說，好集經書，剖別其得失。<sup>100</sup>

換言之，程晉芳自認為自己尚不能通曉《尚書》的奧義，只不過幼時從學於「篤古」之人，略聞師說而已，而這個「篤古者」，極有可能就是程廷祚。因此，程晉芳早年的《尚書》學觀念，尤其是《今文尚書》的部分，或亦是後者一手形塑而成的。而程晉芳先後撰成《尚書今文釋義》與《尚書古文解略》二書，分論今古文，可能就源於乃師以《晚書訂疑》與《尚書通議》二書分論今古文的做法。甚至直到程廷祚身後，程晉芳入四庫館，進一步博覽《尚書》類書籍，並重讀

<sup>99</sup> 程廷祚《〈尚書古文疏證〉辨》曾說：「丙子（1756）季夏，家載園始攜（《尚書古文疏證》）至金陵，時余書已成四載矣。」則《晚書訂疑》當成於乾隆十七年（1752）。吳通福亦主乾隆十七年說，但未予論證，見氏著《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第四章《〈尚書古文疏證〉對《晚書》的考辨》，頁103。關於綿莊早年的《古文尚書冤冤詞》和《晚書訂疑》的關係，綿莊自陳道：「余曩曾為文以正之（引者按：指《古文尚書冤冤詞》）矣，而未盡也，今復為《晚書訂疑》三卷。」見清·程廷祚：《〈晚書訂疑〉自序》，《青溪集》，頁152。而魚門所作的墓志銘中，則說：「先生少時……為《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見清·程晉芳：《綿莊先生墓誌銘》，《青溪集》附錄，頁416-419。）儘管《古文尚書冤冤詞》著成時間無考，但魚門既用「少」字形容，綿莊又生於康熙三十年（1691），至雍正十二年時，已年逾不惑，故而《古文尚書冤冤詞》的著成時間理應早於《古文尚書考》。因此，這裡牽涉一個問題，即當以《古文尚書冤冤詞》抑或《晚書訂疑》作為綿莊辨偽《古文尚書》的標誌，如以前者，則綿莊自然早於惠棟；而如以後者，則惠棟顯然早於綿莊。

<sup>100</sup> 清·程晉芳：《〈尚書今文釋義〉序》，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2，頁714-715。

《尚書通議》時，他依然對書中的大多數觀點感到無比認同，足證程廷祚對他的影響相當深遠。

當然，崇敬歸崇敬，程晉芳對於師說也非全盤接受、一味盲從，從他對《尚書》的認識中，吾人亦可看到「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影子。前文之所以推測程廷祚的影響或許集中於《今文尚書》的部分，正是因為二人對《古文尚書》的基本認識頗有歧異，程廷祚主張《古文尚書》出於元嘉之後，非梅賾所獻者，而程晉芳則不然，他吸收的是閻若璩一派的辨偽意見，反而屢屢以「梅《書》」、「晉人之書」稱之。又如前文所引的〈《尚書通議》跋〉，程晉芳在對乃師的諸多觀點表示認同之後，還對其中的一則提出了質疑：「惟以洞庭為九江，此余所未敢從耳。」<sup>101</sup> 亦可證他對《尚書》另有自己的看法。

## 六、餘論與結語：書類提要出自程晉芳之說重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自己的認識」，不盡是「獨立的認識」，其中亦摻雜了與他人共有的某種共識，而這就要回到本文的起點——《四庫全書總目》——來重新審視了。如果對讀《四庫全書總目》的書類提要與程晉芳的這五篇涉及《尚書》的文章，確實可以看到某些相似之處。司馬朝軍書中僅節引了程氏〈《尚書今文釋義》序〉、〈《尚書古文解略》序〉和《總目》的〈《尚書正義》提要〉、〈《古文尚書疏證》提要〉，即稱「程晉芳關於《尚書》的論述與《總目》大體相合」，<sup>102</sup> 卻未做具體闡發，而細審引文，司馬朝軍似是認為程氏與《總目》皆視古文為偽書，且推尚閻氏辨偽之功，而以毛奇齡的強詞奪理不足成立。誠

<sup>101</sup> 清·程晉芳：〈《尚書通議》跋〉，見《勉行堂文集》，《勉行堂詩文集》，卷5，頁778-779。

<sup>102</sup>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頁50-51。

然，二書趨同之處不少，此皆其犖犖大者，而在一些細節上，《總目》亦與程氏觀點相近。

以上節所引的反對「以洞庭為九江」之說為例，《總目》就有類似的立場。如〈徐文靖《禹貢會箋》提要〉認可此書「不為蔡《傳》所囿」，原因之一即是書中以「九江在潯陽，非洞庭」；<sup>103</sup>〈曹學佺《書傳會衷》提要〉批判此書之粗陋，則說：

其以……九江為洞庭，則皆取舊說之難信者。<sup>104</sup>

而〈胡渭《禹貢錐指》提要〉和〈華玉淳《禹貢約義》提要〉中，館臣則詳加論述：

「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於海」矣。<sup>105</sup>

其……論九江則以九江為洞庭，大抵與胡渭所見同。不知九江自在潯陽，古者江則名江，河則名河，未有以洞庭為九江者，應劭諸家不可廢。且澧江已見於《經》，而雲夢亦跨岳陽之界，洞庭之說終屬未安。<sup>106</sup>

<sup>103</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2 經部書類二，第 1 冊，頁 289 上；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 105 上；又見津圖紀稿第 2 冊，頁 334；又見文溯閣本，頁 75 下；又見文津閣本第 1 冊，頁 191，又見文淵閣本第 68 冊，頁 249 下。

<sup>104</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4 經部書類存目二，第 1 冊，頁 305 上；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 112 上；又見津圖紀稿第 2 冊，頁 397，但「難」字浙本、津圖紀稿均作「不可」。

<sup>105</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2 經部書類二，第 1 冊，頁 286 下；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 103 下；又見津圖紀稿第 2 冊，頁 325；又見文溯閣本，頁 74 上；又見文津閣本第 1 冊，頁 187；又見文淵閣本第 67 冊，頁 212 上。

<sup>106</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4 經部書類存目二，第 1 冊，頁 315 下；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 116 下；又見津圖紀稿第 2 冊，頁 440-441，但「界」字津圖紀稿原作「畧」，紀昀墨筆圈去，並改為「界」。

又如程氏《尚書今文釋義》與《尚書古文解略》分釋今古文，不相淆亂，此體實肇自元吳澄《書纂言》，而對於這一體例，館臣亦有所稱許：

是今文、古文本各為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為有合於古義。<sup>107</sup>

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蓋用吳澄《書纂言》之例，未為無見。<sup>108</sup>

不過從「未為無見」的表述也可看出，館臣的稱許是有所保留的，故在書類小序中，館臣引朱彝尊《經義考》卷七十四之說，對《古文尚書》稍作迴護，認為概而刪之亦非可行：

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sup>109</sup>

或許可以推想，對館臣而言，程氏的二書分釋今古文，而非盡廢古文，纔是更為理想的處理方式。

然而，根據這些相似之處，吾人是否足以得出「《總目》書類提要可能多出程晉芳之手」的結論呢？對於這一問題，筆者的態度亦是有所保留的。首先，就現存分纂稿來看，不僅沒有程氏所撰的《尚書》類書籍的提要，而且還存在不少他人所撰的《尚書》類書籍的提要，可見《總目》書類提要另有來源。

<sup>107</sup> 〈吳澄《書纂言》提要〉，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2 經部書類二，第1冊，頁270下；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96中；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258；又見文淵閣本第61冊，頁1下-2上。文溯閣本、文津閣本無此語。

<sup>108</sup> 〈陸奎勳《今文尚書說》提要〉，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 經部書類存目二，第1冊，頁314上；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116下；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434-435。

<sup>109</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1 經部書類一，第1冊，頁253上；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89中；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193-194。

譬如《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以下簡稱「翁稿」)中,《尚書》類提要共七篇(或六篇),<sup>110</sup>而與《總目》對讀可知,其中蔡璋《尚書講義》、蔣家駒《尚書義疏》、湯奕瑞《禹貢方域考》三書提要,翁稿與《總目》的觀點與詞句均高度相似,特別是《尚書講義》提要中,翁稿原作「即其開首講『曰若』,『若』字作『如』字解,則其書可知矣」,津圖紀稿改為「即其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其書可知矣」,而《總目》又改「其書可知」為「大略可睹」,其修改過程尤為明晰,可以推測《總目》中此三篇提要當源出翁稿。

而姚鼐分纂稿中,呂祖謙《增修書說》的提要與《總目》亦極其近似,且呈現出「姚鼐稿—初次進呈存目、津圖紀稿、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與文溯閣本書前提要—殿本、浙本《總目》」這三個階段的修訂過程。<sup>111</sup>大體而言,第二階段改動最大,初次進呈存目、津圖紀稿與各閣書前提要均刪去了姚鼐稿引朱熹語的部分,並補入了此書卷數的討論,但仍保留有姚鼐稿略去《玉海》書名、將《文獻通考》簡稱為《通考》的痕跡,至第三階段《總目》則針對討論此書卷數的文字進一步加以潤色。這段文字在姚鼐稿中原作:

《書說》者,宋呂祖謙所撰。始〈洛誥〉,終〈秦誓〉,《通考》載其書十卷。朱子云:「伯恭說《書》甚善,但《書》有解說必不可通者,止須闕疑,伯恭必強說,失於過巧。」謂是書也。其門人又雜記祖謙論《書》之說,自〈堯典〉至〈召誥〉,〈召誥〉以前既得於口授語錄,故多俚俗之說。開禧中,祖謙之門人時瀾稍為刪定,俾就雅馴,得二十二卷,又以

<sup>110</sup> 見清·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49-54。然而《洪範正論》一則實非提要,僅是抄錄胡渭自序、魯曾煜序而已,故《四庫提要分纂稿》即僅列六則,見清·翁方綱等撰,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頁38-40。

<sup>111</sup> 姚鼐分纂稿見清·翁方綱等撰,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頁390-391。「初次進呈存目」即《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見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29。

《書說》原本為十三卷，合三十五卷。

而初次進呈存目、津圖紀稿、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與文溯閣本書前提要則改作：

宋呂祖謙撰。其門人時瀾增修。《通考》<sup>112</sup> 云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六卷，悉與此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時瀾所補者，其時尚未成編，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亦互異耳。祖謙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

殿本與浙本《總目》則作：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

而在這段之後，姚鼐稿與《總目》均援引王應麟、吳師道之語加以論述，可見《總目》中呂祖謙《書說》的提要，應出自姚鼐之手。

又如邵晉涵的分纂稿也同樣值得關注，在現存的邵氏提要稿中，《尚書》類提要共三篇，即胡瑗《洪範口義》、趙善湘《洪範統一》、鄭朴《敷文鄭氏書說》三書提要，而它們的文句、觀點與《總目》均有不少雷同之處，足證《總目》論

<sup>112</sup> 「通考」二字上津圖紀稿補有「文獻」二字。

三書得失之語蓋本自邵氏。<sup>113</sup> 無獨有偶，《融堂書解》一書提要亦與邵氏有關。此書在收入《四庫全書》之前，已被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並付梓，而聚珍版叢書的書前提要末尾正署有邵晉涵之名，兩相對讀，唯聚珍版提要中「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一段為《總目》所刪去，張維屏認為是《總目》避複所致，<sup>114</sup> 此外僅間有調換語序之處，而文句幾乎全同，甚至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書前提要也與聚珍版一致，由此可知，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融堂書解》提要係徑用邵晉涵稿，而《總目》則稍作潤飾而已。<sup>115</sup> 另外，筆者又翻檢《通志堂經解》書前序言，可知《總目》中黃度《尚書說》、王天與《尚書纂傳》二書提要，亦有部分文句與納蘭成德所作序言相類，當非館臣首創。<sup>116</sup>

其次，程晉芳的一些《尚書》學觀點，在《總目》中並未體現。如前文述及，程氏頗認可沈彤的《尚書》學，文中亦兩度援引其說，謂古文確係偽作而終不可

<sup>113</sup> 見清·邵晉涵：《南江文鈔》卷3，收入張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5冊，頁253-258；亦見清·翁方綱等撰，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頁444-445。其中鄭朴《敷文鄭氏書說》一書當即津圖紀稿與浙本《總目》著錄的鄭伯熊《鄭敷文書說》，但邵氏何以稱是「鄭朴」所作，尚不清楚。

<sup>114</sup>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8年），附錄一〈《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書前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比較分析研究〉，頁279-280。

<sup>115</sup> 以上翁方綱、姚鼐、邵晉涵分纂稿及聚珍版提要與《總目》的對比詳見附錄。誠然，翁氏纂有提要的這三部書僅被《總目》存目，其書既不受重視，《總目》編纂時徑用分纂稿、罕予潤飾，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姚鼐、邵晉涵纂有提要的四部書均被《總目》著錄，與存目之書相比，其提要當經歷了更漫長的修訂潤色的過程，卻依然保留有姚、邵二氏的觀點，甚至文淵閣本、文溯閣本《融堂書解》提要徑襲自邵稿，亦足表明《總目》書類提要實已吸收了諸多館臣的學術意見。

<sup>116</sup> 見納蘭成德：〈新昌黃氏尚書說序〉、〈梅浦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序〉，見林慶彰、蔣秋華主編，黃智明編輯：《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298、303。關於〈通志堂經解序〉的作者問題，參見林慶彰：〈《通志堂經解》之編纂及其學術價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文獻與諮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頁11-31，後收入《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179-207。

廢，而《總目》則認為：

蓋形長於三《禮》，而《尚書》非其所精。<sup>117</sup>

又如程氏梳理清初《尚書》辨偽的學術史脈絡時，往往將閻若璩、惠棟、程廷祚並舉，《四庫全書》雖收錄了三人的著作，卻未收惠棟與程廷祚的《尚書》類著作，而《總目》更是隻字未提程晉芳頗為看重的程廷祚的《尚書》辨偽工作，僅在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的提要中談到了惠棟：

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偽，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為真。……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証，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sup>118</sup>

對於程晉芳與《總目》觀點的歧異，我們固然可以解釋說，從分纂官起草、總纂官修訂，到總裁官裁正、清高宗欽定，《總目》迭經修改，程氏原稿難免面目全非，未必合其本意，但同時也可以解釋說，《總目》的這一部分本來就並非出自程氏之手。類似地，對於程氏與《總目》觀點的近似，或許亦當作此想。正如前文所言，程晉芳《尚書》學觀念的淵源非常複雜，特別是進入四庫館後，視野與眼界大為拓展，在研討學問的過程中，對於某些問題，館臣之間可能亦漸漸形成某種共識。這種因商榷學術而分享的共識，既有可能源出於程晉芳的獨到

<sup>117</sup> 〈沈彤《尚書小疏》提要〉，見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 經部書類存目二，第1冊，頁318下；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118上；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451。

<sup>118</sup> 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2 經部書類二，第1冊，頁284下至285下；又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頁102；又見津圖紀稿第2冊，頁310-316；又見文溯閣本，頁72下；又見文津閣本第1冊，頁183。但「古文……為真」一段文津閣本作：「初，山陽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蓋本朱子之說，以攻梅賾之偽，條分縷析，已無疑義，奇齡持論務與朱子相反，又與若璩爭名相詬，故作此書以難之。」「再煩較論」文溯閣本、文津閣本作「與之校論」。

見解，亦有可能反過來影響到程晉芳的學術意見，共識與己見之間存在互動與互滲，實難確證《總目》之說係出自程晉芳之手。

總而言之，程晉芳的學術趣向側重宋學，對蔡沈《書集傳》頗為熟稔，而其《尚書》學觀念早年主要形塑於程廷祚，尤其是《今文尚書》的部分，秉承師說較多，至於《古文尚書》部分，則主要吸收的是閻若璩、惠棟一派的辨偽意見和沈彤兼愛、調停的學術立場。程氏畢生篤好藏書與讀書，就現有材料來看，他收藏和閱讀的《尚書》類著作既有辨偽古文之作，亦有衛護古文之作，還有主張古文為偽而不能廢的，而程氏的觀點即傾向於第三種。儘管時人多視程氏為詩人，但他自己對經學——特別是《尚書》學——尤為重視，積十餘年，四易其稿，始纂成《尚書今文釋義》，其間因進入四庫館任總目協勘官，更是讓他得以博覽圖籍、研討學術，進一步修正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有的是程氏獨出心裁的主張，有的是館臣間求同存異的產物，而形諸文字，纔構成了程晉芳與《總目》的異與同。因此，對於程晉芳《尚書》方面的學術觀點的生成過程，吾人或許不能僅作單向度的理解，不能輕易地下斷言稱「《總目》書類提要可能多出程晉芳之手」，而應多方位綜合地考鏡源流，剖析學者的書籍收藏史與閱讀史，審視不同學者、派別之間的交流與影響，庶幾有望還原「四庫學」這一學術場域的歷史現場。

## 附錄：

表 1. 翁方綱、姚鼐、邵晉涵所撰《尚書》類提要與《總目》提要比勘表<sup>119</sup>

## (1) 翁方綱分纂稿

書名、卷數與版本	分纂官所撰提要	《總目》
《尚書講義》 (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尚書講義》二冊，不分卷數，明蔡璋著。璋字達夫，無錫人。其書順文訓義，特高頭講章之類(無足取者)，即其開首講「曰若」，「若」字作「如」字解，則其書可知矣。是崇禎十年舊人鈔本，旁有紅筆圈識，蓋舉業家本子。著錄經部皆無之。或存其目。	明蔡璋撰。璋字達夫，無錫人。是書順文敷衍，無所發明。 <sup>120</sup> 其 <sup>121</sup> 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大略可睹 <sup>122</sup> 矣。書凡兩冊，為明季寫本。當時朱墨標識猶存，疑即璋之原稿云。
《尚書義疏》	《尚書義疏》二冊，不分卷數，不著編撰年月，題曰「丹陽蔣家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字千里，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懷集縣

<sup>119</sup> 本表所錄分纂稿，見於清·翁方綱等撰，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頁38-40、390-391、444-445；武英殿聚珍版提要見於宋·錢時撰：《融堂書解》，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目錄頁3a-5a；《總目》提要見於殿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1、12、14，第1冊，頁254-255、259-260、264-265、307、312、315；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卷11、12、14，頁90-91、92、94-95、113、115、116。分纂稿與《總目》的相同文句均以下劃線標出。

<sup>120</sup> 「無所發明」，津圖紀稿作「膚淺頗甚」。

<sup>121</sup> 浙本、津圖紀稿「其」上有「即」字。

<sup>122</sup> 「大略可睹」，津圖紀稿作「其書可知」，與翁稿同，亦可證此書提要源自翁稿。

<p>(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p>	<p>駒千里氏輯,《鎮江府志》亦無其人。其解經順文解義,亦坊本高頭講章之類,鈔本綴以圈點,蓋舉業家之書也。或酌存目。</p>	<p>知縣。  是編亦高頭講章之類,抄本綴以圈點,其體段皆<sup>123</sup>時文。</p>
<p>《禹貢方域考》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p>	<p>《禹貢方域考》一卷,國朝湯奕瑞著。奕瑞號玉峰,南豐人。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錐指》而作。然其序中所謂程葆舒、陳師凱、艾南英之書,程、陳二書不見於朱彝尊《經義考》,蓋奕瑞就所見言之耳。存目。</p>	<p>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峰,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鹽場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為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為渭書之節本云。</p>

(2) 姚鼐分纂稿

書名、卷數與版本	分纂官所撰提要	《總目》
<p>《書說》三十五卷(內府)</p>	<p>《書說》者,宋呂祖謙所撰。始〈洛誥〉,終〈秦誓〉,《通考》載其書十卷。朱子云:「伯恭說《書》甚善,但《書》有解說</p>	<p>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p>

<sup>123</sup> 浙本、津圖紀稿「皆」下有「類」字。

藏本)	<p>必不可通者，止須闕疑，伯恭必強說，失於過巧。」謂是書也。</p> <p>其門人又雜記祖謙論《書》之說，自〈堯典〉至〈召誥〉，〈召誥〉以前既得於口授語錄，故多俚俗之說。開禧中，祖謙之門人<u>時瀾</u>稍為刪定，俾就雅馴，得二十二卷，又以《書說》原本為十三卷，合三十五卷。<u>王應麟</u>云：「<u>林少穎</u>《書說》至〈洛誥〉而終，<u>呂成公</u>《書說》自〈洛誥〉而始。」蓋<u>林之奇</u>受學於<u>呂居仁</u>，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故所著《書說》始於〈洛誥〉，是祖謙用意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u>時瀾</u>所增修者則又以全備祖謙一人之說也。</p>	<p>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u>時瀾</u>所增修也。</p> <p>原書<sup>125</sup>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u>瀾</u>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p> <p><u>王應麟</u>《玉海》<sup>126</sup>云<sup>127</sup>：「<u>林少穎</u>《書說》至〈洛誥〉而終，<u>呂成公</u>《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u>呂居仁</u>，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u>瀾</u>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p> <p><u>瀾</u>，婺州清江人。<u>厲鶚</u>《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u>周必大</u>《平園集》有<sup>128</sup>祭<u>瀾</u>文，稱「從</p>
-----	--	---

<sup>125</sup> 「祖謙有《古周易》」至「原書」，初次進呈存目、津圖紀稿、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皆作「其門人時瀾增修。《通考》云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六卷，悉與此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時瀾所補者，其時尚未成編，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亦互異耳。祖謙原書」，「通考」二字上津圖紀稿補有「文獻」二字。

<sup>126</sup> 「玉海」二字，初次進呈存目無，與姚鼐稿同，亦可證此書提要源自姚鼐稿。

<sup>127</sup> 「云」，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作「稱」。

<sup>128</sup> 「平園集有」四字，初次進呈存目無。

	<p>吳師道云：「<u>葵之清江時鑄壽</u>（鄉）〔卿〕<sup>124</sup>，<u>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群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灑、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u>」然則是《書說》一名《書傳》。其首有瀾自序，謂<u>以西邸文學入三山時成之</u>。</p>	<p>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為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p> <p>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群從弟子<sup>129</sup>十餘人悉從公遊。若灑、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為《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註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p>
--	--	---

(3) 邵晉涵所撰提要稿

書名、卷數與版本	分纂官所撰提要	《總目》
《洪範口義》	《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翼之撰。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

<sup>124</sup> 原作「鄉」，據《總目》等改。

<sup>129</sup> 「子弟」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弟子」，與姚鼐稿同，亦可證此書提要源自姚鼐稿。

<p>二 卷 (永樂大典本)</p>	<p><u>《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列「未見」一門。《永樂大典》中尚存完本。</u></p> <p>晁公武謂「<u>係門人所錄，無緒次首尾</u>」，今按其書先後貫澈，條理整齊，當為<u>瑗自撰之書</u>。</p> <p>……</p> <p>瑗於諸儒中<u>最為醇謹</u>，然如釋「<u>天錫洪範</u>」為「<u>錫自帝堯</u>」，不取神龜負文之瑞；五行次第定為<u>箕子所陳</u>，而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u>五福六極</u>」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皆<u>駁正注疏，自抒心得</u>。又詳舉《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語更精確。要其大旨，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p>	<p>是書<u>《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u>。今其文散見<u>《永樂大典》中，尚可排纂成書</u>。《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p> <p>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u>瑗門人編錄，故無註<sup>130</sup>次首尾</u>。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為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為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u>天錫洪範</u>」為「<u>錫自帝堯</u>」，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為<u>箕子所陳</u>，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u>五福六極</u>」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u>駁正註疏，自抒心得</u>。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註經，特為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p>
------------------------	---	--

<sup>130</sup> 「詮」，津圖紀稿、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作「銓」。

<p>《洪範統一》一卷（永樂大典本）</p>	<p>疇之本。……</p> <p>《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贈少師，《宋史》有傳。</p> <p>此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經義考》又作《統紀》，今按善湘自序，定為《統一》。善湘謂：「漢儒〈鴻範五行傳〉祇以五事庶徵為五行之驗，而五（行）〔紀〕<sup>131</sup> 八政諸疇散而不傳其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為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視）〔事〕<sup>132</sup> 則貌、</p>	<p>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迹具《宋史》本傳。據其子汝楫〈周易輯聞序〉，善湘於《易》學用力至深，而所著書<sup>134</sup> 五種皆不傳。此書藏棄之家亦罕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從《永樂大典》繕錄，復為完編。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為五行之驗，而五（行）〔紀〕<sup>135</sup> 八政（謂）〔諸〕<sup>136</sup> 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為<sup>137</sup> 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p>
------------------------	---	--

<sup>131</sup> 殿本、浙本、津圖紀稿、文津閣本、文溯閣本皆作「行」，據文淵閣本、趙善湘序及〈洪範〉改。

<sup>132</sup> 原作「視」，據《總目》及〈洪範〉改。

<sup>134</sup> 「書」，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作「易說」。

<sup>135</sup> 殿本、浙本、津圖紀稿、文津閣本、文溯閣本皆作「行」，據文淵閣本、趙善湘序及〈洪範〉改。

<sup>136</sup> 殿本、浙本、津圖紀稿皆作「謂」，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作「為」，據文淵閣本改。

<sup>137</sup> 「為」，文津閣本無。

	<p>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疇)〔統〕<sup>133</sup> 而九疇可以一貫矣。」先是，朱子與陸氏九淵論「皇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為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兩家之長者也。《經義考》列「未見」一門，今從《永樂大典》中按經文前後編次如左。</p>	<p>大典》題曰《洪範統一》為名實相應矣。考朱子與陸九淵論「皇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為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生當分朋講學<sup>138</sup> 之時，而超<sup>139</sup> 然不預於門戶，是難能也。</p>
<p>《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p>	<p>《敷文鄭氏書說》，宋鄭朴撰…… 朴長於持論，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幾；〈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自伸其說。……</p>	<p>宋鄭伯熊撰…… 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p>
<p>《融堂書解》二十卷（永樂</p>	<p>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于楊簡。熙寧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所著惟《兩漢筆記》尚存于</p>	<p>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于楊簡。嘉熙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案時《兩漢筆記》之前載有尚書省劄，</p>

<sup>133</sup> 原作「疇」，據《總目》及文義改。

<sup>138</sup> 「學」，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勝」。

<sup>139</sup> 「超」，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作「介」。

<p>大典本)</p>	<p>世，而此書向尠傳本，故黃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p> <p>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掇編輯。中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于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p> <p>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p>	<p>列時所著諸書，有《尚書啟蒙》。又載嚴州進<sup>141</sup> 狀，則稱《尚書演義》。同時案牘之文，已自相違異。《永樂大典》所載則皆題錢時《融堂書解》，其名又殊。然《永樂大典》皆據內府宋本採入，當必無訛。朱彝尊《經義考》以《尚書演義》著錄，蓋未睹中秘書也。舊本久佚，今採掇哀輯，重為編次。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尚皆篇帙完善，不失舊觀。時之意，主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具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說，引伸其義。雖因仍舊說，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證，然用意則<sup>142</sup>可謂精勤。</p> <p>所解如「羲和曠厥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sup>143</sup> 孔安</p>
-------------	--	---

<sup>141</sup> 「進」，文津閣本無。

<sup>142</sup> 「則」，文津閣本作「亦」，與聚珍版提要同，亦可證此書提要源自邵晉涵之手。

<sup>143</sup> 「用」，文津閣本作「因」。

<p>時所解如「義和曠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p> <p>至以〈泰誓〉為告西岐師旅，〈牧誓〉為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謂〈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為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為未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於〈洛誥〉，尤為卓然有見，不惑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薦準尚書省筭取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尚書演義》三十冊，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為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筭狀二通錄冠</p>	<p>國《傳》，〈康王之誥〉則兼採張九成《書說》，不專主一家之學。</p> <p>至以〈泰誓〉為告西岐師旅，〈牧誓〉為告遠方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謂〈武成〉本無脫簡，前為武王告師之辭，後為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為東都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於〈洛誥〉，尤為不惑於曲說。亦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也。</p> <p>其書省筭、進狀皆不著卷數，《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以篇帙頗繁，謹約<sup>144</sup>略離析，勒為二十</p>
---	---

<sup>144</sup> 「約」，文津閣本無。

	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釐為二十卷，詮次如左。 <sup>140</sup>	卷。
--	--	----

<sup>140</sup> 文淵閣本、文溯閣本均與聚珍版提要一致，亦可證此書提要源自邵晉涵之手，唯文溯閣本「向」作「尚」，「掇」作「綴」。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南宋·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南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南宋·呂祖謙撰：《增修東萊書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南宋·錢時撰：《融堂書解》，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 \_\_\_\_\_：《融堂書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南宋·胡瑗撰：《洪範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南宋·趙善湘撰：《洪範統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吳澄撰：《書纂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
-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底本為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增修本。
- \_\_\_\_\_：《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底本為清李彥章校刻本。

-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清·盛百二：《尚書釋天》，清乾隆十八年（1753）秀水李氏刻本。
- \_\_\_\_\_：《尚書釋天》，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城書院刻本。
- 清·程廷祚：《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清·永瑢、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永瑢等撰，王伯祥斷句：《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清·永瑢、紀昀等撰：《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 清·閻若璩撰：《潛丘筮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徐鵬導讀：《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清·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清稿本。
- 清·沈彤：《果堂集》，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 清·佚名撰，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陳珮撰：《閨房集》，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 清·惠棟：《古文尚書考》，清乾隆宋廷弼刻本。
- 清·徐文靖撰：《禹貢會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年。

清·胡渭撰：《禹貢錐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清·翁方綱等撰，吳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振綺堂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不分卷本。

《振綺堂書目》，1927年東方學會鉛印四卷本。

《振綺堂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四卷本。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金毓黻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張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翁覃谿先生書學海類編目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著

古國順：《清代尚書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朱廷獻：《尚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
-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黃智明編輯：《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 馬雍：《尚書史話》，《古代要籍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張舜徽著：《清人筆記條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8年。
- 梁啟超著，俞國林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 程治國：《程晉芳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_\_\_\_\_：《清學札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
- 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戴君仁：《閩毛古文尚書公案》，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9年。

## （二）論文

- 王春林：〈「朱熹疑偽《古文尚書》」一說考辨〉，《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8期，頁41-45。
- 王勇：〈程晉芳著述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3期，頁112-116。
- 杜澤遜：〈讀新見程晉芳一篇四庫提要分撰稿〉，《圖書館建設》1995年第5期，頁70-71。
- 李雪：〈論新見汪氏《振綺堂書目》的特點與價值〉，《圖書館學刊》2018年第7期，

頁129-134。

林慶彰：〈《通志堂經解》之編纂及其學術價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文獻與諮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頁11-31，後收入《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179-207。

姜龍翔：〈朱子疑《古文尚書》再探〉，《嘉大中文學報》第5期，2011年3月，頁129-154。DOI:10.29892/JCLNCU.201103.0005

郭曉東：〈略論莊存與的經學思想：以莊氏《春秋》學為討論中心〉，《經學、政治與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34-170。

曹美秀：〈程晉芳與翁方綱之交遊與論學〉，《文與哲》第36期，2020年6月，頁257-310。

張翔：〈程晉芳及其桂宦藏書〉，《晉圖學刊》2002年第3期，頁72-73。

程治國：〈關於程晉芳生平的幾點考辨〉，《陝西教育（理論版）》2006年第12期，頁301、304。

楊洪升、李雪：〈新發現的汪氏振綺堂四庫進呈書目〉，《文獻》2017年第1期，頁172-178。

楊錦先：〈程晉芳的里貫與科第〉，《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41。

劉人鵬：〈論朱子未嘗疑「古文尚書」為偽作〉，《清華學報》第22卷第4期，1992年12月，頁399。

賴志偉：〈莊存與的《尚書》研究：對《尚書既見》的新解讀與新看法〉，《原道》第28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頁145-157。

魏世民：〈論程晉芳與袁枚之交誼和學術往來〉，《徽學》第8卷，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12月，頁304-311。

鍾雲瑞：〈清代沈彤《尚書》學研究〉，「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會議論文，江蘇：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圖書館，2019年6月1-2日，頁1060-1066。

